

炎黃春秋

第10期
2006年

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吕正操在文革中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附庸伦理与文人助纣为虐

目录

春秋笔

- 1 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项小米
11 吕正操在文革中 方小宁

求实篇

- 20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秦福荃
27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高华
33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李金明

人物志

- 38 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刘仰东
44 何孟雄——迭经坎坷的骁将 李永玲

怀人篇

- 47 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龚育之
50 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解力夫
53 李庄和我在动乱年月的一段经历 袁鹰
56 李慎之二三事 陈乐民

往事录

- 59 一份历史文献的保存经过 王鹏

一家言

- 62 从周正毅到张荣坤 周瑞金
64 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关系认识的修正 江春泽

品书斋

- 68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高放

古今谈

- 72 附庸伦理与文人助纣为虐 张绪山

专稿

- 75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下)

顾问

杜润生 李昌 于光远 李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普 李一蠡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鹰 凌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迪 韩钢
雷颐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徐孔(常务)
杨继绳 吴思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理事: 白建钢

秘书长: 徐孔

副秘书长: 杜明朋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来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真: (010)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邓子恢主政农村工作部的悲剧

项小米

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就绪,从1953年2月起开始工作。

农村工作部甫建,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对待和指导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从政治上划分,有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及未解放地区;从经营方式上划分,有单干、互助组及合作社形式。对于四亿农民来说,单干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合作化之于他们,是一种完全新鲜的事物。无论老区和新区,都数量不等地成立了互助组,有的成立了合作社。大多数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组织同时受到政府肯定和保护的一种共同抵御天灾,解决资金、农具、劳力不足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互助组在解放前就存在,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互助组,至于合作社,更不必说了,是在当地干部急于求成、甚至为了用虚假成绩邀功请赏而强迫命令下形成的,如此做法,理所当然地在农民中引起疑虑与不满。这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他们有的是苦挣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才过上温饱生活,有的是在土改中刚刚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农具,锄耙还没攥热,突然告诉他们,这一切还要拿回去和贫农们“共产”,他们的抵触和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农民们的这种抵抗与民主革命时期对恶霸地主的抵抗有着本质不同,基本是一种自戕,破坏农具、杀掉牲口、砍伐树木,颇有些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宁肯大家坐不成,也不让一个人抬了去”。但就是这样的反抗,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相当惊人的。

邓子恢和他的农村工作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合作化如何“化”?“化”多少?如何解决合作化问题上求多求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命题,不化不行,化快了也不行。应该说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初衷本是一致的。1953年2月9日,邓子恢在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发表就职演说时曾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邓子恢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以及当时的党中央在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共同思想,或者说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它的最初启动。

“办社！”“办社！”

农业合作化，办合作社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里从来没有人搞过，没有前人的经验。哪怕教训可以借鉴，没有书本，没有理论。在国外，倒是有苏联先于我们搞了集体农庄，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1939年的大饥馑给苏联政权造成的严重威胁，人们大批死去、流亡，民族骚乱一起再起……这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盲目搞个人崇拜固然有关，然而忽视农业、集体农庄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农业合作化怎样搞？对邓子恢、对老一代革命家包括对毛泽东，都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应该慎而又慎的未知数。

对于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关键在于要能够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能够使农民稳步地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对于贫困户，它能够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中农，它能够保证顺利自然地过渡到集体经济，避免突然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损失。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什么要分这三步走，邓子恢有他的理由：在互助组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完全保留，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按劳分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三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一方面适应农民，一方面改造农民，使农民一步步从实际中自己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决不能凭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一蹴而就。当时初步设想，在全国成立高级合作社大约要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10—15年。而在当时，也即1953年的主要

任务，是全力办好互助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子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1952年冬季以来，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股“热潮”，在广大农村中汹涌着一股很强的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野蛮行为。

急躁冒进倾向的产生，与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盲目的社会主义热情有关，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的追求形式、盲目攀高的浮夸作风是更大更深也是更主要的原因。

面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狂热，邓子恢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一貫襟怀坦白的他，决心将自己的看法直陈中央。

1953年2月24日，他向来农村工作部视察的朱德提出：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制订的互助合作发展计划的指标定大了，要考虑。他清醒地指出“我们定大了，地方会更大”。

同年3月3日，邓子恢在部务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3月8日，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毫不讳言：自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普遍发展的倾向，是急躁冒进。他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干部思想认识上有误解，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邓子恢把这理解为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默许和赞同，接着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首先，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三个文件，中央先后于1953年3月8日、14日、16日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

继而，由邓子恢主持、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于3月26日发表。

1953年3月12日，他参加了华北局的互助合作会议，帮助华北局压缩了1953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

4月13日，他受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部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农也就是农民小私有者的问题。互助合作要稳步前进，任何过快过“左”的政策，都会破坏与中农的合作。

1953年4月1日，毛泽东将前面所说的三个文件及《人民日报》社论汇编成册，冠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的题目下发，要求各级认真学习。今天看得很清楚，这三个文件均出自邓子恢之手，而毛泽东将其汇编成册，无疑是对邓子恢一系列举措的首肯，起码也是一次投石问路。

邓子恢的举措通过农村工作部高速而卓有成效的运转贯彻下去了。邓子恢手下有一班精兵强将，邓子恢之下，有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陈伯达、廖鲁言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有“太行四才子”之一美誉的秘书长杜润生，农村工作部是中央农村工作的办事机构，每两月向中央做一次专题报告，要请示的问题单独提出，尾巴上不要“当否请示”字句，用中央名义发布决议、文件。一个这样的权力机构加上一个强悍的班子，邓子恢应该是得心应手的。

经过一段紧张艰苦的整顿，1953年农村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买卖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停止了，农民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农村生产恢复正常。各级干部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认识，一度沉寂的互助组重新活跃起来，到53年11月，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2%，比1952年增长20%，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万多个。秋后，农民们看到互助组、合作社



1957年2月23日，邓子恢（前左二）陪同刘少奇（前左一）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

收成普遍都比单干好，务实的农民对合作化产生兴趣。到此可以说，合作化运动初步展示出令人心悦的前景。

可惜的是那段日子太短了，短得不足以完成一段美好的梦想。

毛泽东说办合作社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仅仅在两个月前，农村工作部下发的一系列纠正急躁冒进的文件，都还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两个月后，事情却在毛泽东那里起了变化。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稍后，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并留他们吃饭，毛泽东说：“总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

10月15日，邓子恢在南方考察期间，毛泽东

在北京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中说：“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般规律是从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邓子恢在上海收到了廖鲁言关于这次谈话的来信，他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对纠正急躁冒进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很清楚，三大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下发之后，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农村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农普遍安心了。这一形势必须要稳定住，决不能再翻回去。而这一切，毛泽东清楚吗？强烈的责任感驱使邓子恢连夜给中央写报告，在报告中他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讲清了农村目前形势之后，他仍坚持“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

1953年10月26日，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廖鲁言主持下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0月15日的谈话，各大区负责人原本准备就如何纠正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作发言的，突然听到毛泽东这个讲话，一时不知所措。但这时是建国伊始，正是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会议很快转为对毛泽东讲话的理解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化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日益显出重要的地位”。会议结束前一天，毛泽东又一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这一次谈话的分量要严重得多。毛泽东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干涉过多”。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十分明显，都是针对邓子恢的。

此时，正在福建农村调查的邓子恢得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矛头所指，他心里很清楚。但令他担心的，并非自己的意见遭到曲解与否定，而是刚刚好转起来的农村形势又将全面回潮。

果然，第三次互助合作化会议之后，合作化热再度升温。

“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

1954年10月10日，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化会议召开，会议宣布，到1955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60万个。

1955年1月，全国已办起新社30多万个，并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向邓子恢汇报，东北有50%的社没有完成建社程序，5%的农户可能退社；山东新建社够条件的只有20%——30%。与此同时，粮食统购全面铺开，由于54年夏季的严重水灾，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收购却比原计划多了100亿斤，原因是许多干部为了超额完成收购指标，强迫农民交粮甚至收了农民的口粮，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于是又一次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再度出现。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口头、书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未表示不同意见。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1955年1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接着，邓子恢又于1月5日至2月初赴鄂湘粤三省考察，考察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58万个。相当一些地区办得不错，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快过滥、严重脱离实际。当时河北已发展到10万个，山东8万，安徽3万，浙江4万，这些地区情况都很紧张。经过与地方严格论证，冀鲁皖三省均缩减了发展指标。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形成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布置粮食统购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文件，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等修改，于3月3日由毛泽东签署发布。

即使是在今天，仍能感觉到《紧急指示》发布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急迫。《紧急指示》开篇即言：“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紧急指示》将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减为900亿斤（后来又两次减低），并决定把合作社步骤放慢。

《紧急指示》签发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到1957年入社农户达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泽东把速度一下子放到如此之慢，是邓子恢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农村工作的计划中，57年达到50%农户入社还是可能的。邓子恢兴奋地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谈到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看法终于与自己趋于一致了，内心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正如他的担心不是为着自己一样，他的喜悦也同样不是为着自己。

在农村工作部的全力调整、干预下，仍然没能遏制住农村合作化的不断“升温”，到1955年，已呈现无法控制的趋势，以浙江省为最。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只占全省农户总数的0.6%，到1955年猛增到30%，农业社发展到41880个，另有自发社15000个。由于粮食问题的更加突出，省委忙于抓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出现失控局面。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把粮食卖掉、牲口杀掉，也不愿将它们拿去充公。农业社的大批早产，使得它的肌体十分脆弱，稍遇风吹雨打便可能夭折，加上不少社是在干部的强迫命令下硬凑起来的，根本没有凝聚力，不久，便有很多合作社垮了台。

农村工作部在作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向中央反映了浙江农村的紧张局势，并于1955年3月

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了《对浙江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电文说：

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同《紧急指示》一样，仅从这份电文的开头部分，就可以清晰地嗅到当年浙江农村的紧张气息了。这份电文，经邓子恢修改、陈伯达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话：“主席同意。”

浙江省委接到电文后，一致同意：“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并立即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作了布置。会后，全省进行了合作社整顿，干部纷纷下乡宣传互利、自愿政策，侵害中农利益的现象得到纠正，消除了群众认为合作社就是“合伙平产”的误会，问题大的社，根据农民意愿，由社转回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过整顿，全省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减少15607个。6月21日，谭震林在浙江向中央报告：“浙江收缩了一万多个社以后，合作社生产都很好，绝大部分增产有把握。”

浙江及全国收缩合作社的原因及其作法，邓子恢分别在1955年4月和6月向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邓子恢《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报告中提出的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55年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刘少奇说：“明年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进敲门。”

从55年1月初邓子恢代中央拟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下发以后，全国合作社进行了几个月的整顿。在此期间合作社有“缩”也有“发”，两者相抵，在原有的67万个合作社基础上减少了2万多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流传的邓子恢在1955年砍掉20万个合作

社的说法,与事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风云突变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身穿白色衬衣、头戴草帽的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

毛泽东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不无联系。他所说的“有关部门”,指的还是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柯庆施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农村中各种阶层和势力。

柯庆施到北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时,有意将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份汇报应该说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听取汇报的人对汇报内容的“取”“舍”。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对汇报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视,当即印发到会领导人手一份,并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上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继而,毛泽东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浙江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这是很欠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面对这样严厉而不公的批评,邓子恢内心很难平静。事情的对与错姑且不论,单凭“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这一点,对邓子

恢就是不公的。基本事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制订的每一件有关农业政策法规的大事,都经过审慎的讨论并经过中央反复研究批准。但尽管如此,邓子恢凭着高度的党性和委曲求全的博大胸怀,还是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将被毛泽东批评的这一切承揽了下来,分别向中央和浙江省委作了检讨。

1955年5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都比上年翻一番。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约见邓子恢谈话,根据自己在南方考察得出的印象和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当时没有表态,他在经过认真思索后,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子恢认为上年由11万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下年按计划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将大大超出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邓子恢的根据是: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第二,根据各地反映,现有65万个社存在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尚很繁重,如果再过多过快发展势必影响质量,合作化威信下降,反而欲速不达;第三,应接受苏联、匈牙利合作化过急的教训,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双方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这次谈话的情况部机关很快就知道了,许多人暗暗替邓子恢担心,有人找上门劝邓子恢部长:“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邓子恢坦然地说:“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谭震林、杜润生,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要杜润生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送他一阅,着手撰写《关于

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中央定于 7 月底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在毛泽东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和邓小平“吹风”之后,邓子恢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这是为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准备的发言稿。已经是泰山压顶了,他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坚持发展 100 万个合作社的意见,并在发言稿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办法。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始,毛泽东情绪激昂地讲了那段“文革”中我们倒背如流但在当时莫名其妙的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他同邓子恢的争论在全党面前公开了。

8 月 26 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共和国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自此由农村工作的决策者降为执行者。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随之大权上交。

10 月 4 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



1961 年 4 月,邓子恢在基层调查期间向龙岩地委干部宣讲《农村工作六十条》

幕 248 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邓子恢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一人持异议。会议热烈而亢奋地批判了合作化问题上“反急躁”、“反冒进”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情此景,在四年后的庐山上几乎如同拷贝似的重映了一遍,而被批判的主角,是同样忠诚、同样铁骨铮铮的、真正替人民说话的共产党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最后一次冲浪

继 56 年批邓子恢“反冒进”、57 年反右、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全党全国陷入一股愈来愈丧失理智的极“左”狂潮。当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以为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正伴随着极“左”狂潮接踵而来。不仅粮食、棉花、食油连带轻重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国民经济滑至崩溃边缘。城市居民实行粮食限量,浮肿病肝病流行,就连中南海里的领袖们,也把每餐的肉类卡到最低限度。最惨的当然还是农民。在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浮夸风愈盛的地方死人愈多,河南信阳地区仅正阳、新蔡两县就死亡 18 万人,1960 年一年,全国人口净减 1000 万。

粮食!粮食!

党内一些仁人志士又在幻想着补天了。这些

人里当然包括了邓子恢。

61年春,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龙溪县做调查,在漳州与先期在闽西做过调查的张鼎丞相遇。张鼎丞向他反映了闽西龙岩地区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情况,告诉他江山公社饿死了许多人,劝他回龙岩看看。邓子恢自离开龙岩后,只在56年回过一次乡,出于对自己职务和“避嫌”的考虑,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回乡的。但他想到在北京时曾接到不少家乡来信中反映的严重情况,便决定回去看看。

回乡的20多天里,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家乡农民带来的灾难。他在内战时期开创闽西苏区根据地领导农民最早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面对着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是什么滋味我们不难揣摩。正是这片土地,当年为革命捐献出了那么多鲜血和儿女,而革命给了他们什么呢?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居然只能用蕉芋粉来待客!邓子恢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也不顾身边医务人员的劝阻,含着眼泪喝下了拌着糖精的蕉芋粉。

在邓子恢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将托人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下进了几口大锅,用面条招待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几个老人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于5月13日向中央写了《闽西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应允许社员开荒、粮食包产利多害少、山林问题等许多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修改后《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中,全部被吸收进去了。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作了一番交谈。

邓子恢是在中央广州会议期间听说安徽“责

任田”的情况的。3年困难时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于政策不同,情况就大不相同。农村工作部去安徽调查的干部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

河南新蔡的农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颍上去要饭,河南农民对安徽农民说:“老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袄换你一点粮食吃?”安徽农民说:“这样,你饿是饿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冻死吗?”安徽农民给了河南农民十几斤粮食,把棉袄还给了他。

邓子恢听后兴奋不已:“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问题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反映“包产到户”好,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汇报调查情况时,谈了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一致肯定。

邓子恢于1962年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谈到“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从61年实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就增产18%,农民非常欢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做法的决议。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恼,想不通。邓子恢清楚,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责任田”问题受到批判,改正“责任田”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这是省委也无力回天的事情。邓子恢内心矛盾得很,过问“责任田”,肯定要再次担当风险;不过问,下边干部的期望会落空,“责任田”也必定会夭折。思索再三,他还是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南下安徽。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随后又收到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两份材料针对“责任田”情况均做了详细汇报,认为责任制把产量与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了起来,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解决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态度消极、不顾质量的问题,对恢复生产起到极大作用。

为稳妥起见,邓子恢叫王观澜再度到符离集所在县安徽宿县调查。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样。由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们纷纷表示:“包产到户

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农民的呼声和干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邓子恢心上。然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决的。55年距离此时不过才7年时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七千人大会上已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在这个时候要提“责任田”问题，风险将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对中国农业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农民，如此急切的呼声，他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思来想去，他无法卸下肩上的责任，他准备再一次涅槃了。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认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是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认为“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时再议。有一个看法大家是一致的，必须改变大锅饭的做法，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

“责任田”能否实行，关键只在一个人了——毛泽东

7月17日，从邯郸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内容时，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



在邓子恢追悼大会上，周恩来向邓子恢夫人陈兰及其子女表示慰问

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曾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对于这次谈话，邓子恢清楚要承担风险，但没有想到一场雷霆暴雨会这么快就骤然而至。

1962年7月25日，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按原计划，这次会议应先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问题，然后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之后，风帆便再一次转向了，转为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泽东说：“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毛泽东讲话打开闸门之后，批判的洪水立刻汹涌起来。有些人批判邓子恢的报告，有些人把未经整理的邓子恢的讲

话记录拿来批判，还有一些人干脆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翻手云覆手雨，昨天还在主张“责任田”也可以试试，今天脸一变就像不认识了似的，大骂主张搞“责任田”的人是断定要在农村搞资本主义。

一些好心的同志悄悄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适当做些自我批评。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作者注：这也许就是‘文革’中号称邓子恢砍掉20万合作社的出处），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多次批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面对这种局面，邓子恢无法做任何解释。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10月5日，邓子恢心情沉重地步入农村工作部会议室，在这里参加了他在农村工作部十年里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

两年之后，1965年1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个人从30年代开始的辉煌，就这样熄灭了。

“文革”来临，我党又多了一个默默无言的老人

1966年，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对于这场风暴，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更何况身上已遭数次重创的邓子恢。

党内斗争的机密流向社会，红卫兵纷纷涌向万寿路10号邓子恢的住所，轮番揪斗这个当年敢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党内“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常常一斗就是几个小时，弯腰、戴帽，有人还动手打他。66岁的邓子恢已是古稀之年，常因批

斗时间太长站立不住而瘫坐在地上，每次批斗之后回家都几天起不了床。

1967年1月，在戚本禹唆使下，农大学生闯进邓子恢家，企图抄出55年至62年期间的文件档案。红卫兵气势汹汹，而警卫人员似乎也接到了什么指示，口称“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而对红卫兵装作视而不见。眼见红卫兵砸开了一只铁皮柜，幸亏里面没有文件。情况紧急，邓子恢拿起红机子与中南海通话，要求对他的住宅、主要是对文件加以保护。两天之后，造反派依然自由出入，而红电话机却被撤走了。

特供被取消了，房子要收回，寒冬来临，农林口机关造反派居然停了邓子恢家的暖气。邓子恢患有严重的肺炎，最重时一年发作11次，犯一次就加重一次。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撤掉他的暖气，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邓子恢更沉默了。已是风烛残年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终于，他的肝病、糖尿病、肺病、脑萎缩几病并发。曾经在北京医院看病治病的“特权”也被取消，邓子恢只能由儿子陪着，到北大医院门诊挂号看病，护士在诊室门口大呼“邓子恢”的口号，所有人都睁大惊诧的眼睛，唯独不感到惊诧的，只有儿子和他自己。

70年邓子恢病情加重，经请示中央，终于得以住进北京医院，但只能住进副部级病房，护理、药品与过去的待遇相比都要差许多。由于长期的腹泻、发烧，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如果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后果不堪设想。夫人陈兰几次恳求医院给加铺一块地毯，都被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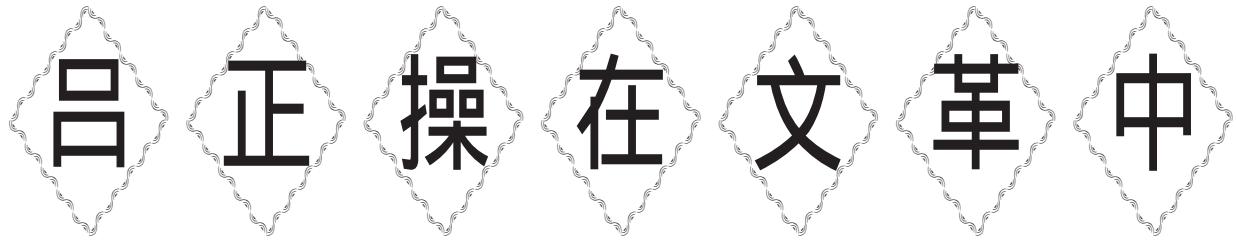
政治歧视就像瘟疫一样传染到社会各个角落。邓子恢是个宽厚的人，更不是吃不得苦。三年游击战争那样的苦他都吃过去了。人不怕伤皮伤肉，怕的是伤心。

正是这块地毯，成为邓子恢致命的原因。陈兰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在病房跌倒，后脑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造成颅底粉碎性骨折，两天之后，辞世而去。

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在建国后受到的两次错误批判平反，恢复名誉。

（责任编辑：致中 萧徐）



● 方小宁

度过了 60 年代初天灾人祸的困难 ,到 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 ,建国后十余年来实践奠下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基础 ,此时正渐入佳境。

这年的 1 月 ,经全国人大提名通过 ,自 1958 年起便代行部长职务的吕正操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把国家的重托 ,视为责任和使命——他期待在大江南北弹奏出纵横万里 ,荣盛百方 ,强国富民的崭新乐章。

此间 ,“三线铁路”建设正是紧张时刻 ;1956 年就筹建的北京地下铁 ,也开始动工 ;路网建设、旧线修复、科技开发都在抓紧进行。一天 ,吕正操从贵州返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还就援建坦赞铁路的事情对他说 :“这件事我只是征求你的意见 ,这样大的事情 ,要等请示主席后才好决定。我先给你吹吹风 ,好有个思想准备。”坦赞铁路 1800 多公里 ,沿线深山峡谷沼泽交错 ,工程宏大艰巨 ,吕正操并不怕压力 ,对于工作 ,他游刃有余。

然而 ,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开始前 ,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 ,林彪抛出阴险的“桃园三结义” ,诬陷彭真、林枫、吕正操为“反林彪小集团” ;污蔑吕正操 1946 年在东北时期追随彭真 ,反对林彪 ,要他向中央“还账”。

彭真受到批判 ,吕正操在劫难逃。

不久 ,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在西南组织和指挥铁路大会战、兼铁道兵第一政委的吕正操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会议几天结束 ,正想立即返回西南 ,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却突然遭到批判。吕正操只得滞留北京 ,连篇累牍地触及灵魂写检查交代问题。

据当时也因事返京 ,亲历其景的副部长刘建章回忆 :吕正操被批判后 ,铁道部组织召开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 ,令吕正操交代与彭真、林枫三人反对林彪的所谓“桃园三结义”问题以及所谓国民党对其策反的问题。

刘建章也被通知参加了那些小型会议 ,但没有发言 ,每次会后 ,刘建章的秘书和吕正操的秘书都到吕家去看看 ,刘建章自己也去。他说 :“我颇感不安 ,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

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同志约见刘建章 ,让他回西南去继续管好三线铁路的修建。谷牧说 :“看来 ,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 ,他是回不去了 ,老刘啊 !现在斗争很激烈 ,老吕回不去了 ,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于是 ,刘建章离开北京 ,返回西昌。

一面挨批判 ,一面要保证领袖接见红卫兵

铁道部机关出现了揭发批判吕正操的大字报、小字报 :“吕正操的讲话没有突出政治” ;“篡改铁道兵的建军方向” ;“工改兵是篡夺铁道兵军权的阴谋” ;“为右派翻案” ;“技术挂帅”等等 ,围攻之势越演越烈。吕正操所作的深刻检查更成了“反面教材”。

不久 ,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连。作为国家主要交通工具的铁路 ,客运量顿时狂飚式暴增 :1966 年 8 月 18 日 -11 月 25 日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师生。据《新中国铁路 50 年》统计 :铁路共运送了 5600 多万人 ,人均行程 568 公里 ;仅 9 、 10 月间 ,全路加开师生专列 6996 列 ,其中发往北京 5493 列。

正常的运输秩序完全被打乱，大批物资积压。吕正操一面挨批判，一面顶着重压，采取果断措施，在非常状态下，力挽失控，保证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的串连活动，保证了国家建设重点物资的运输。

在相当紧张的9月、10月，吕正操召开了全路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立即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重点抓运动，一个班子重点抓运输建设，强调铁路职工要坚守生产岗位；宣布大多数党组织和铁道干部是好的，不能把所有的党组织和干部都打倒。

对于这场运动，吕正操尽管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但他仍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努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力图减轻运输秩序混乱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破坏。

周恩来：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一月风暴”。

1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抛出“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公开点吕正操的名。造反派连推带撞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据当年参加了批斗大会的红卫兵回忆：那天寒风凛冽，被造反派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吕正操胸前挂着坠弯腰的黑牌子，他被反绑着双手，冷得鼻涕直流，也不给擦，都要结成冰了。造反派唾星直喷，指鼻戳脸，车轮式地辱骂，呼着震天的革命口号……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们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周总理亲自把他交给在会场执勤的铁道兵战士护送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造反派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吕家揪斗、抄家、“破四旧”。家里的东西横遭洗劫，连自行车、手表也被掠走，书籍和一些小摆设也成了小将们的目标。“他们‘破’了我很多重要的东西。”吕正操后来说，他的笔记本、日记本、各种资料等，

都被损毁或不翼而飞。一家如此，全国有多少珍宝都被愚昧地糟蹋了！家里再不能呆，三个大孩子已然离家，夫人刘沙也只有带着小女儿暂避老战友处。

在极端混乱时期，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吕正操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趟车离京。吕正操回忆道：在周总理日夜操劳、亲自坐镇的指挥和多方保护下，我勉强支撑应付着急剧激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周总理无奈地说：“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吕正操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了不算。”

毛泽东要保吕正操，但仍被关押七年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跟周恩来说：“要保吕正操。”周恩来还特地到大连找林彪，当面向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表面答应了，背地里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康生搞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迫害不断升级。

1967年7月，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恶毒制造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在1946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还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并据此认定：“这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问题起了质的变化，吕正操被斗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实际情况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位同志，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及旧政治协商会议，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配合发表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

20世纪60年代盛行“莫须有”。吕正操由此被打成了“罪大恶极”的“敌人”。“叛党投敌”冤案的制造，是怎样地颠倒黑白，骇人听闻。

林彪、江青之流，为了制造吕正操的“罪

证”，还把早已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赵君迈抓来，横加毒打，逼迫他们承认策反过吕正操。同时还把早已作了结论的事情重新翻出来：1946年吕正操根据党的决定，做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秦至诚的工作。此事后来却被国民党特务诬蔑为吕正操“接受了敌人送的委任状”。这件事情，国家公安部过去已多次调查，走遍几省，查证了60余人，多次写报告证实：“系敌人的层层欺骗，根本与吕正操同志无关。”1953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明确指出：“犯人所供离奇之处甚多，都是不可信的。防止人家害我们。”这早已搞清楚了的、与吕正操根本无关的问题，却在二十余年后被别有用心地作为阴谋整人的炮弹。

到1968年底，名单里的42人大多数被实行“监护”、遭受刑讯逼供，其中包括：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

1969年1月，这桩大冤案的制造者，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2名，部、厅、局级干部36名，全国政协委员7名，省政协委员17名。他们胡说什么“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军地下党员、干部等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捏造的“反革命集团”里。受牵连者达700人，株连亲属、下属不下数千人。

该案的“主犯”一共7人：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解方、刘澜波。吕正操位列头名，遭受法西斯地狱式的摧残、监禁长达7年。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及陈先舟、车向忱等被迫害致死；解方、刘澜波也分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滚出去！”我跟他们斗得最厉害了

1967年7月12日，吕正操“束手就擒”，被非法关押在京郊通县，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

“监护”。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

开始，吕正操还把被批斗看成群众运动的冲击，虔诚地“斗倒‘我’字，去掉‘私’字，从头改造，重新革命”，但却怎样也过不了关：“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用心。对文革，毛主席批评的‘三很’我都有。”

有一段时间，吕正操精神压抑，苦闷困惑，遗憾难受，辗转睡不着觉。他打鬼子出生入死，建铁路废寝忘食，不说有多大贡献，但尽心尽力，一片赤诚。党对自己也很信任。毛泽东曾评价他：“既会带兵打仗，又能动脑子办事。”记得有一次，江青向他乱发脾气，毛泽东还让江青向他道歉。万万没想到竟被打成牛鬼蛇神，戴上叛党、反党的帽子，遭受非人凌辱摧残，更让人忧虑的是国家大乱了。百口莫辩，百思不解，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吕正操原来有吃安眠药才睡着的习惯，“人家把我看过来的时候，不给我吃安眠药，但我也睡着了。”人类的承受能力真是神秘莫测！

“在里面挨打，是常事，我也还手，也打。但

彻底砸烂彭真、林枫、吕正操 ‘桃园三结义’反革命集团



首都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红旗公社》

他们人多,年轻。”吕正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顽强地抗争着。

随着迫害升级,深思宽阔的吕正操跳出凝重痛苦的反省,重新认识所遭受的迫害,察觉其中非同寻常:阴谋出自林彪、江青、康生之流那里。

吕正操向来厌恶反复无常、见风使舵、逢迎吹拍一套,而且敢讲真话、敢直言。解放战争任林彪副手时,他曾对林彪把东北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表示过不同意见,后来党中央的回电,修改了林彪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四平之战的具体打法,吕正操也觉得指挥“很笨”,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牺牲……诸如此类工作上的不同观点,当时和他住前后院的林彪都有一本账,早就把他看成障碍,有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陷害、迫害变本加厉,以至批斗、关押。而他们更大的阴谋是篡党夺权。



吕正操(左)和彭德怀在50年代末

吕正操相信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他顶住压力,坚持炼狱中的抗争与锻炼。看守仍然没完没了地提审,强迫他交代罪行、写揭发材料,白天如此,晚上如此,不让他休息,甚至跑进他的牢房呵斥,乌鸦似的鼓噪,损害他的精神健康。

画地为牢。吕正操反其意而用之,予以还击,不让小丑们得逞,勇敢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不让恶魔践踏灵魂。“他们想折腾我,找人在我房里看着我,逼问我黑后台。我说:‘滚出去!我最厉害了,天天跟看管我的人吵架,跟他们斗得最厉害!’

尊严地活着 拒绝“人圈”式放风

关押吕正操的是原来营房的房子,约有12平方米,因为是要犯,一人一间。里面有木板床、破桌椅和门窗各一。窗户关死了,里面用厚木板钉得严严实实,玻璃涂上了油漆;外面围着铁丝。牢房里不见日月,连无处不在的新鲜空气也仿佛被一同隔离,甚难透进。牢门紧锁着,门板上开了个用作监视的小洞。房顶上无一例外地亮着刺眼的灯光。睡觉被强迫平躺,以便监视者能一目了然。

室内的空气很混浊,放风透透气成了恩赐般的待遇。有人甚至以此为题作对:洞房花烛夜,监牢放风时。放风处是几个被隔开的小天井,在押的人都单独放风。开始是十天半月放风一次,后来几天一次,再后来是一两天一次。

“他们叫放风,跟日本人在冀中搞的‘人圈’差不多。”我说:“到‘人圈’里干什么。我不去放风!我就不去。”吕正操追述道。

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驯化冀中人民,切断八路军和百姓的联系,强行集家并村,把村民迁进他们划定的居住地,四周建起高达3米的围墙,墙上架设铁丝网,闸门定时开关。村民们被牲畜似的圈在一起,高密度地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进出都要报告,完全没有自由,若稍有反抗,日军就血腥屠杀,百姓憎恶地称之为“人圈”。

“大米发霉,没菜吃,老吃白菜帮子。”被

监护时的伙食根本谈不上营养，还难吃难咽，但为了维持生命，吕正操总是全部吞进肚子里。

夏天的蚊子又多又凶，轮番来吸血。吕正操练出眼力、耐力，一打一个准。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环境，吕正操体质不断下降，但生病吃药也被控制——“医疗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对“叛党、反党分子”不施仁政。

“我得了喉炎，他们不给药吃，说是喉癌要给我开刀。我说，我不让你们开。”吕正操十分警觉，坚决不让他们借机残害自己。他不会自杀，也不想被他杀。

自小就有一股犟劲的吕正操，“认罪态度”、“改造态度”一直不好，实际上专案组也找不到他的什么“叛党”铁证，提审次数渐少。他争取到看书读报的权利，还悄悄写了《显微镜》、《斥假证》、《逼、供、信》等诗。录其中的《斥假证》如下：

居然谓叛党，梦寐未曾想，
羁身入囹圄，异端从天降。
蒋贼谋陷害，垂死犹栽赃，
借刀以杀人，狠毒逾豺狼。
捏造假证据，离奇又荒唐，
用心想一想，祸心难包藏。
当事不分析，据以下定论，
构成奇冤案，株连无穷尽。
助匪行反间，为蒋泄私恨，
猾贼匿狞笑，魔爪终得伸。
顺水可推舟，匪特变功臣，
仇快亲所痛，敌友我不分。
不利于革命，贻害在人民，
翘首质日月，愿以明素心。

当时只允许抽劣质烟，这些吟啸自若，写于铁窗之下的诗篇，就记在劣质的烟盒纸上保留下来了。

株连冤狱的重现

“文革”开始时，夫人刘沙任第八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此前，她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几年，当过学校的党委委员。

那天一早，刘沙听到广播里播送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她不知道这

大字报的背景，却了解聂元梓的为人，便诧异地说：“怎么又搞到《人民日报》去了，什么人搞的鬼？”

她的话马上被反映上去，“诬蔑聂元梓，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随即扣下来。刘沙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大会、小会地受批判，同时还要她揭发吕正操，企图打开缺口，查找到“黑后台”。刘沙那句“什么人搞的鬼”的话还传到了康生那里。他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给八机部打电话，直接点了刘沙的名。

刘沙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非法关押了70多天。

但迫害却并未停止。1968年1月，中央专案组“二办”开进八机部，勒令刘沙“交代吕正操在东北的重大历史问题”。刘沙当场和专案组顶撞起来。专案组恼羞成怒，决定对刘沙上专政手段。

刘沙被戴上冷冰冰的手铐，被抓进监牢。

在狱中，专案人员反复追问她“吕正操叛党的罪行”。刘沙坦然以对：“子虚乌有。没什么可说。”不提审时，她就读书、看报，在长宽不足7步的囚室原地跑步，边跑边念叨着：“坚持就是胜利。”还写一首诗言志：“你死我活鏖战急，是人是鬼当自知。擎天有柱天勿坠，驱散乌云见红日。”

不久，吕正操90岁的母亲与在家的小女儿被驱赶出门。老人回到海城老家，年仅15岁的小女儿去了北大荒的建设兵团。好好的一个家，虽未人亡，却已四散。生活艰苦可以忍受，最恐怖的是政治诬陷、政治折磨。

“瓜蔓抄”——同姓人也遭了殃。他的一个堂兄弟被造反派拿钉子钉进头上致死，却说他“自绝于人民”，那是当年相当流行的害死人还要陷被害人于不义的颠倒黑白之词；辽宁的一位干部被问到是否知道“桃园三结义”。他以为问《三国演义》的刘、关、张，快嘴回答：知道。结果被打成了“叛党集团”成员。

1970年2月，刘沙被解除监禁，送往河南信阳八机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继续实行“政治隔离”。不恢复组织生活，不准亲属看望。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境况才有所改善，恢复了组织生活，联系上子女。

“株连”又叫“株联”，指一人有罪而牵连多人。它始于秦。《汉书·刑法志》曰：“秦用商鞅，连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参夷”，即诛三族；到隋炀帝时，发明了“株连九族”；及至民国，蒋介石“宁可杀错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诛杀革命者及亲朋戚友等等；林彪、“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迫害无数干部、群众，用的也是古老惨烈的酷刑，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苦难中相濡以沫

又是午夜了，看不见星，看不见月。

蚊子像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盘旋，不扔炸弹，却伺机吸血传播细菌。

人不能没有记忆和念向。无论是睡着、醒着，吕正操都会想起老战友、老朋友——程子华、黄敬、孙志远、刘建章……孤寂中，无以排解的思绪，默默化为他心中的诗句：

“风雨飘摇日，我怀子华兄。巨细持己见，爱憎太分明。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年别，竟尔失其踪。”这是思念程子华的。程子华建国后为首任山西省委书记。他在战争年代双手致残，端脸盆只能用手臂架着。“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任上被关押，生活无人帮忙，真不知怎样艰难地独自熬过几年岁月。吕正操还记得自己在程子华的婚宴上，仗义助兴痛饮，喜庆热闹得独一无二，自己几乎被一群女将灌醉了

……

后来，吕家的孩子悄悄把父亲狱中用纸烟盒写的诗带给程子华。程子华细品老战友的诗中情愫，百感交集，泪水涩苦。

“乱世宁馨偏多才，弛张表里袒胸怀。歌舞绮罗曾入梦，持论公道四六开。”这是怀念黄敬的。寥寥数句，概括了他的一生。黄敬当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参加革命很早。建国时，才37岁但已是老革命的黄敬，出任天津首任市长。他风趣地说：“敌人使我们长期与本阶级脱离，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因过于操劳，身体透支得病。毛泽东曾捎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但因积疾太深，年仅46岁辞世。

“把酒论当世，兄亦嗜酒人。大圜犹酩酊，小醉自沉沦。箴言成终古，呓语记犹新。故友方散尽，我亦等轻尘。”这是悼念孙志远的。当年小樵改编后，孙志远协助吕正操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同把部队锻炼成威武之师。建国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抓万吨水压机制造，参加大庆油田开发，提出“争取局部空中优势”计划。“文革”之初，受中央文革残酷迫害，突发脑溢血，大喊一声：“不公平啊！”饮恨长逝。

这些都是在冀中患难与共，生死同在的战友，吕正操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或健硕或清瘦的面容，好像又听见他们各带乡音的笑语，怎能想象这些忠诚无私的老共产党员，竟会被堂皇的

“革命”名义，关在充满浓重血腥味的革命监狱里！

还有化工部副部长张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有张学思，是公子哥但完全没有公子气，赤胆忠心，精通海军业务，却被诬陷为特务，折磨致死。临终前，想吃水煮土豆，想开开窗户透气也不准，他艰难写下“恶魔缠身”四字，撒手人寰；还有铁道部的班子，工作中大家坦诚相见，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他沉入了无边



走出漩涡后的交谈——胡耀邦（右）和吕正操在70年代末

的往事……

铁道部造反派开始批判吕正操时，有人向滕代远反映说：“吕正操在党组会上反对过你。”滕代远当即严正地说：“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在党组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把意见摆到桌面，讨论清楚，统一认识，才能做好工作。”并说：“你们为了打倒吕正操，把什么问题都强加给他，是不对的。即使在他代理部长期间，我还是部长，这时期铁道部的错误，我也要负责任。”滕代远当时也被抄家，却能为保护同志直言不讳。

副局长武竞天被诬蔑为叛徒，造反派责令吕正操跟着喊口号批斗。吕正操说：“那是你们定的。我没有材料，没有根据。”坚持不举手挥拳，也决不跟这些人乱喊，坚守着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刘建章比吕正操小5岁，却有长者风的厚朴稳重，在工作上是吕正操的好搭档，在“文革”中也未能躲过厄运。他于稍后的1968年2月被关进秦城监狱。所幸妻子没被关押。她不顾受监视、受牵连的危险，尽力保护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她曾到吕家所属居委会查找孩子的下落，吕正操的小女儿从北大荒回京，也曾暂住她家。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里，关于雪中送炭、仗义执言的描述有不少，而真正能让人从心灵深处得到慰藉的，是道义的援手。正是“哲人重道义，同道定见怜。”朋友之间，夹杂着功利的自私脆弱性和原本的圣洁崇高，它们往往携手而至，考验着人。大千世界，人间百态，主流还是：正道。

《宁古塔志》有云：“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回首往事，吕正操说：“批判我们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有资产，才能算得上资产阶级，我们当的官不小，但没有私人财产，连房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干的事，都是给国家干的。那时候，真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各级政府那么好的风气，被弄坏了。最坏是康生，搞‘人治’。大家为建设祖国出力，他生前一味乱整走资本主义道路。林彪说：不理解，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整了那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我他妈越实践越不理解，完全失去了信心。很多人跟风，这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的私念私欲所致。他们最终也不会捞到好处。”

“她 - 是谁？”父女相见不相识

1972年3月，刘沙因病从干校回北京治疗。甫到北京，她就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看望吕正操。毛泽东批示可以探视。刘沙立即通知分散在各地的孩子，让他们想办法尽快赶回北京。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他们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那是何等揪心的6年！

4月26日，刘沙和儿女们来到卫戍区。被关押了近2000天的吕正操，瘦得很厉害，皮包骨头，脸如菜色，原来敏锐、智慧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刚毅中深藏着疲惫和潜隐的痛苦。林彪、“四人帮”竟把这位热爱生活和人民，令鬼子闻风丧胆的开国将军，折磨成体弱多病的“犯人”！

当见到一位灵秀的姑娘来到面前，久未说话的吕正操吐词含混，问道：“她 - 是谁？”听说这就是被隔离时还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儿，吕正操深感快慰地笑起来。他的嘴里空空荡荡，牙齿已脱落了十几颗。

第二次探视时，刘沙跟吕正操讲：“你应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问题如实说清，家里给你送上去。切不可对毛主席见外，我可以请求中央派人来取！”

据吕正操大女儿彤岩回忆：他们去看父亲，大家都默契地不说伤心事，或讲讲在北大荒农场出的洋相、当地风土人情；或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趣事；或谈谈读了什么革命书籍。吕正操虽身陷囹圄，但依旧专心读书，静观其变。他反复阅读马、恩、列、斯、毛等允许看的书籍和报刊，更客观地琢磨一些问题，从报刊的细微变化中获取信息。人纵然被禁锢，但思想可以自由飞翔。

孩子们都秉承了父母亲的豁达。他们每次见面总是平静地说一些高兴好玩、带劲儿的事。有一次，讲起什么，会心大笑，看守见状厉声斥责，吕正操和他们论理，结果被罚一个月不准家人探视。

吕正操说：“不都是要让我屈服吗！我不屈服。”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据实陈情。

1973年初秋，刘沙被宣布获得“解放”了。她相信这就是好的转机，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为丈夫申诉。



吕正操下连队

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盛大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采取的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

7月31日下午,周恩来抱病参加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得以恢复自由的吕正操等几位军队干部。吕正操没说多少话,只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

当时也在场的张春桥阴阳怪气地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

吕正操马上顶回去:“做工作哪能没有错的?过去工作有错,今后再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的。”

当晚7点钟,政治局全体成员30多人又接见了他们几位老同志。周总理紧紧握着吕正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在意嘛!”

吕正操看到周总理面容消瘦,忍泪问候他的健康,周总理安慰道:“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吕正操不久得知,周总理是因为膀胱

癌手术。

谈话间,江青走来说:“你的事,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吕正操知道江青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势,不卑不亢地说:“早出来晚出来都没关系,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衡,文革中一直被关押,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让他出来工作,请吕正操先把消息告诉他。杜者衡得知如重获新生一样,高兴得举杯痛饮,

导致心脏病发,遽然病逝。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起这件事,感叹道:“老干部能够解放的还是快点解放,解放晚了,就怕动不了了,辽宁的杜者衡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保健工作要跟上来,杜者衡是死在家里的,如果救护及时,不至于嘛。曾山、陈正人也是非常可惜的。”

举一隅可以反三隅。当年的情况,大体如此。

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工作还没有安排,冤案也还没彻底平反。监狱数年,身心受损的吕正操,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与同样未安排工作的刘建章天天乘公共汽车去打网球,连日寇追杀也没能阻止的、深具吸引力的爱好又恢复了。有时挤不上公共汽车,两人就边走边聊,到家就吃饭,日子过得单纯、自如多了。

如此大约半年。吕正操的健康渐渐得以恢复。

1975年初,海城发生大地震。周恩来记得吕正操就是海城人,特别指定他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让他重返故乡,一方面送去党的关怀,一方面看望遭到大灾难的父老乡亲们。当知道他出狱不久,没有可出远门的御寒棉衣,周总理立即予以

解决了。这样,无官无职无秘书的吕正操临时带上小儿子随行,协助团长华国锋,完成了“解放”出来后总理交给的第一项工作。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1975年1月,吕正操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人大常委。

1975年春,吕正操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实质是借学习的名义,把学员当批判的靶子。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说:“中央读书班是受‘四人帮’严格控制的,‘左’的势力十分猖獗。胡耀邦、吕正操、程子华等少数老干部在班里处于被批判、被监督的地位。”坚持极左还是否定极左的斗争仍很激烈。

读书班组织学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吕正操则另路而行,利用这个机会学习马、恩著作,做读书笔记,与同学悄悄探讨一些问题。在读书班里,他有个深刻印象,就是胡耀邦的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他评价说:胡耀邦很爱读书,涉猎广,思考问题深,人正直坦荡,光明磊落,也吃了亏。

这年8月,冤案尚未彻底平反的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兵第一政委。

1976年,“四人帮”垮台。复出的胡耀邦冒着被再次打倒的风险拨乱反正,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理论上,冲破各种禁区,从深度、广度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组织上,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召开大会,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集团‘案件’彻底平反”。11月5日《辽宁日报》报道:该案复查结果证明,所谓“东

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假案,是林彪、“四人帮”集团蓄意制造出来的,并决定对在该案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90人,一律平反;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妥善安置;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假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并给被平反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同年12月1日,中共铁道部党组在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了文号为“(80)铁党字五号”的《关于为吕正操、万里等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的文件,文号为:(80)铁党字5号。文内写道:“现经复查,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东北叛党集团’及其一切莫须有罪名,纯系捏造诬陷。中共铁道部党组决定,为吕正操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对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通知所有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同志、亲友所在单位,按规定销毁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中国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大革文化命!”吕正操说。

(责任编辑 萧徐)

订《北京文学》免费参加 —

“与著名作家零距离共同畅游祖国大好河山”!

凡订阅2007年全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读者,只要将订阅发票复印件、详细的联系方式寄到:100031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发行部,就将有机会参加抽奖(截止时间为2007年2月28号),我们将从中抽取20名幸运者,参加2007年5月份由我社组织的“与著名作家零距离畅游祖国大好河山”活动。本次活动时间为一周,全程由我社支付费用,与当今最著名的作家一起采风、交流。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邮发代号:2-85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邮发代号:82-106

统一定价:

7元

特别说明:为了考虑地区差异,我们的活动将分别在南北两条线路进行,中奖者可任意挑选一条线路参加,如本人因故不能参与,可把机会转让给指定的朋友。



杂志社地址: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100031) 销售热线:010-66031108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 秦福荃

博古和潘汉年的友谊

博古认识潘汉年是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震动全国，震惊世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各地纷纷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锡社”在“无锡”筹划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的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这时博古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按照党的指示，要把追悼活动办成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因此在人手上很紧缺。

就在这个时候，三月中旬的一天，潘汉年来到会场，找到博古，自荐愿意参加筹备工作。经过交谈，博古得知他在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已经学了半年了。春节前回宜兴老家，在母亲的主持下，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与一个许姓女子结了婚，婚后又匆忙赶来无锡继续学习。

经过几天接触，博古觉得潘汉年很有能力，处事机灵，写东西快捷通顺，办事利落，就请他负责宣传，并兼顾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

三月下旬，博古投身革命的启蒙老师、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来无锡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博古介绍潘汉年与恽代英相见，恽代英了解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建议潘汉年去革命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工作。博古因为尚在苏州市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还没有毕业，追悼活动结束后，即将去苏州继续上学，所以不能和潘汉年同去上海。三月底，两人惜别后，潘汉年即赴上海，四月底进入中华书局当校对。

一九三〇年九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一九三〇年十月，潘汉年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中宣部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挚友沈泽民也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央宣传部任新闻宣传主管，是潘汉年的领导。由于大家都在搞报刊宣传工作，不久博古和潘汉年又重逢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有一天对博古说，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潘汉年。于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底，潘汉年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一九三一年是当时处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二月七日英勇牺牲。四月二十七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返回上海时，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知道党的机密极多，清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所以顾的叛变，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避免了对党的机构的

严重破坏。

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而遭敌人逮捕，在二十四日就叛变了，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亏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了，但敌人在全市大搜捕，使周恩来难以长期在上海继续存身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在一九二五年无锡筹备开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和进行追悼活动中，博古已经亲眼目睹了他负责保卫工作的过细能力。于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博古和王明约定潘汉年为联络员

进入九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的人员，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了三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

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随后报共产国际，十月十日获得共产国际批准。这项安排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中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尤其是博古在同李立三路线斗争中和王明联手，共过患难。因此这个班子是王明完全信得过的班子。它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这也是王明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个临时班子不设总书记，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因此王明给自己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

第二项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第一条“切记”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临时



中共早期领导人博古

政治局在上海坚持下去。实在难以坚持，就迁往闽赣苏区，但必须先派人报告共产国际，再迁出上海。同时必须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把这块根据地建成中央的根据地。第二条“切记”是：尽量不要召开“五中全会”，不要改变四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要强调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并批准的会议结果，必须尊重。情况发展到实在非开“五中全会”不可时，也应提前向共产国际报告召开的理由，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再开。第三条“切记”是：从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国民党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

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朋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第三项是要发动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军警特务斗争,要紧紧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保护临时政治局在上海的安全,使临时政治局能在上海扎根。为此王明成立了“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调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擅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帅孟奇(女)任“破反会”书记。这样内线有陈云、潘汉年的中央特科,外线有帅孟奇的“破反委”,负责临时政治局的安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一九三〇年前后两人都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常有接触,被捕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李竹声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潘汉年到达瑞金。博古十分高兴,留潘汉年同宿,细谈别后上海的情况。当时中央红军在三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土改“查田”运动亦取得了胜利,边贸开展得很活跃,根据地正在发展,军队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正好前几天彭德怀向博古提出要给他配个政治干部,杨尚昆愿意去与彭共事。杨尚昆说:“彭总是条汉子,为人坦荡,与他共事有安全感。”现在潘汉年来了,正好接杨尚昆的工作,让杨去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潘汉年就接任杨尚昆原来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在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

大转移(万里长征)开始前,博古把潘汉年从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岗位上调回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部队一起转移,为的是使潘汉年能留在身边。

派陈云、潘汉年去共产国际汇报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

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作,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俩人都流泪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王明此时此刻受到的殊荣，也是他一生中所达到的最顶峰。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潘汉年、张浩受命回国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张浩把他被党组织从沈阳监狱营救出来后，改名张浩，后被派往莫斯科，以及这次受王明之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



潘汉年

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

在一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和二月三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七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什么蒋介石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呢，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开始这个谈判呢。原来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钱和武器，就让陈果夫出面与共产党高层联系。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

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四月八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七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 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乘火车到达西安，八月七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毛泽东说 潘汉年不可信用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和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毛和周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

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国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第二条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恩来说：“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毛泽东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说：“现在陈果夫要的是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

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

博古与潘汉年临别前的一次谈话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我派你和陈云去莫斯科后，张、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你脑子里带密电码，又以谈判代表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待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认为他既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时就是我们的上级，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共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



毛泽东和博古在一起

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毛派邓发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阐明，中共中央有权更换代表团成员，取得季米特洛夫支持。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这次你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潘汉年很关心博古的处境，博古说：“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潘汉年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潘汉年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五四年，发生“高饶事件”。在对饶漱石审查中，发现他有叛党嫌疑，特别在接管上海前夕，批准任用原国民党特务胡均鹤参加公安肃反工作，于是认定饶为国民党在华东的代理人。接着联系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诚自首人员上有重大问题，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从而开始追

查负责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

一九五五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一九四三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四月二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直接制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翻阅了潘汉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来往电报，及同潘汉年有来往的全部人员的相关档案，审问了有关的在押敌伪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反复核实，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在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并未引起重视。相反，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毛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由于毛泽东的“宽容”，潘汉年得以继续活命。一九六三年二月三日出狱，在北京公安局的团河劳动农场，被管制生活。一九六七年三月，谢富治又把他抓回监狱。一九七五年五月送湖南第三劳改农场安置，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布结论：“无期徒刑”。

潘汉年在监狱中和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带着“无期徒刑”的结论病故。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证。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责任编辑 萧徐）

文海捞“珍”——全国最具可读性的文摘报

作家文摘报

邮发代号 1-190

感受 历史节奏
关注 社会变迁
体验 时代韵律
品味 生活情趣

电话服务 11185 即打即订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

单价 1.00 元 每月 8.15 元 全年 97.80 元 每周二、五 精彩奉献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100027 北京市东城区王家胡同 10 号商之苑大厦 010-65518025/26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 高 华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

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

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红军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

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珍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徐梦秋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

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在共产党的处境还很艰难的时候，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

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在1934-1937年间，《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

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

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

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惟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

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于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准确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惟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一般基层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八十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

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及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中共重大的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共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责任编辑 萧徐）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 李金明

一、“肃托”在冀中大面积展开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在此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的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推波助澜,惟恐“漏”过一个坏人,使运动不断扩大化。

中央的文件传达到冀中后,因当时冀中情况较混乱,抗日武装多头管辖,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文件精神无法贯彻,传达贯彻受到了限制。

1938年4月21日,冀中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冀中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会议代表500多人,代表着全区8000多名党员。会议整整开了12天,5月2日结束。大会分析了冀中地区斗争形势,总结了建军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大会选举黄敬、鲁贲、孟庆山、吕正操、张君、周小舟、孙志远等为冀中区委委员,黄敬为书记,鲁贲为副书记。

为解决抗日武装中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人民自卫军(以原东北军吕正操691团起义部队为主组建)和河北游击队(以红军团长孟庆山与冀中当地党组织组建)互相猜疑、互相摩擦,干部中本位主义严重及军阀主义、农民习气等问题,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河北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和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领导机关兼。吕正操任司令,孟庆山任副司令,李英武任司令部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正任供给部部长。纵队下辖4个支队(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辖4个团。安平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开赴河间,与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教导队合编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

随着冀中党代会的召开和冀中抗日武装进行改编,党组织也逐步健全起来,这就有了贯彻“肃托”文件的条件。为了落实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除奸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边区公安总局对于“肃托”下了很大力量。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这是轻车熟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就抓过“右派”、“AB团”,湘鄂西根据地肃过“改组派”,鄂豫皖杀过“第三党”、“AB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

8月,为使“肃托”工作深入发展,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肃托”工作小组到冀中进行监督检查。

原第9分区国防剧社女生队队长黄克、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的爱人后来谈起“肃托”时,仍毛骨悚然。她讲了自己18岁时亲身经历的事情。

“肃托”开始,先是学习讨论,认识“‘托派’比日寇还危险”。然后就是互相揭发,看看谁有“托派”言论。再下一步就是把有“托派”言论的人抓起来,用吊打、不让睡觉等方式逼、供、信,必须使“托派”供出一个同伙方可罢休。国防剧社有个姓王的北平知识分子,带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写活报剧、写歌词,还能拉小提琴、说快板。他很爱与人开玩笑,

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同志。大家都叫他“王瞎子”。“肃托”开始，剧社反复讨论，找不着“托派”，就拿他去凑数。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写的歌词里有一句“大干、傻干加巧干”。“傻干”是什么意思？就是诬蔑八路军。

几天后开公审大会，同时公审的还有一个连队胖司务长。这个司务长人缘不太好，可能是贪污了几个面袋。开公审会中，主持人要大家提处理意见，有人说：“让他去当马夫”，有人说：“让他加倍赔钱”，也有人说：“砍头”。关键时刻，不知他嘟囔了一句什么，一下子惹恼了大家。表决砍头时，“哗啦”举起不少手臂，一数，超过了半数，通过！然后押到河堤上去执行。

国防剧社的“王瞎子”也被押上去执行。开始时胖司务长还叫喊：“我冤枉、我冤枉！我不拿面袋，我家8口人没裤子穿啊！唐河战斗，我光着脚，把全连1000多块大洋背回来……”后来见喊叫没用了，拿大刀的战士走来，他就开始憋足了气，红着脸练气功。看着的人们不知谁小声说：“完了！完了！”

“嚓、嚓”大刀一挥，两颗人头滚下河堤，“王瞎子”的眼镜跌到远处的草地上，沾满了血。



冀中领导人之一王平

这时，被定成“托派”的，一是爱给领导提意见、讲怪话的；二是有军阀习气、游击习气和其它毛病的；三是相互之间有意见，借机泄私愤的。

首当其冲的是原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这些人大都是冀中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自由散漫惯了，当兵后毛病一时难以改掉，再加上说话随便，爱乱议论，在人人过关、相互揭发的“肃托”运动中，你说我，我说你，很容易“肃”出大批“托派”来。再加上地主坏分子趁机搅混水，运动越搞越乱。

较有代表性的是被搞成“托派”的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兼政治主任杨万林、团长崔树凯3人。这3个人都是参加过1932年中共领导的“高蠡暴动”的老党员，暴动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中共保东特委指示发展抗日队伍，根据当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由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阴谋未得逞。1938年5月份，已有很多地主子弟混入部队，借“肃托”机会，用联名“控告信”做借口，告到冀中军区。

冀中军区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段士增和河北游击军第2师的问题，有的上级监察组的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弄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是典型的‘托派’应该处决！……”

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极力反对，他说：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要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队伍中有贡献。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处决。

有人说：这不是有联名告状信吗？说他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应该严惩。

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他家盖了小楼，那也得调查核实啊！

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冀中第一次党代会后，部队进行整编，命令第2师到河间集中，该师拖延了几天。这样，“新罪”、“旧罪”一齐算，将其定为“托派”。5月中

旬,第2师4000余人在段士增、杨万林带领下,开到河间接受整编,冀中某主要领导给孟庆山打电话,命令立刻将段士增等3人抓起来,孟庆山虽经解释,但仍解释不通,无奈之际只得将其抓捕。

随着“肃托”运动的发展,情况越发严重,有关领导几次来电话,命令孟庆山将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3人处决。孟庆山在电话里苦口解释,说:“这3人都是部队的好干部,虽然有错误,但实在不应枪毙。”

1938年5月24日,孟庆山随第9分区机关转移到高阳县莘桥镇,夜里,孟庆山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了防止敌情,他有枕着电话睡觉的习惯,这晚电话照例放在耳边,当时线路较差,电话串了线,孟庆山听到某领导和另外一个人讲话:如果他再不处决段士增他们,就连他一块处决……

孟庆山出了一身冷汗,一轱辘坐起来,脑子里激烈斗争好久,他经历过苏区的“肃托”,知道抵制“肃托”的危险下场。最后,他一咬牙站起,走出门外,喊警卫连:“把那几个‘托派’提出去,处决!”

这几天已处决好几批了,警卫连长闻令没说话,带几个人到后院将段士增、杨万林从看守室带出来。段士增二人见半夜将自己押出,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走到前院,见孟庆山和几个随从人员站在月光下,段士增走到孟庆山面前,问:“老孟,这是干什么?”

孟庆山往前走了一步,眼睛有些湿润:“老段,上级几次来命令,让执行你们,不执行不行了……”

段士增昂着头:“上级党就不调查一下,他们说俺们家盖起了小洋楼,他们就不兴去看看?俺娘还在家住着,那炕上的席子都是半边的,被子烂的提不起来。”

孟庆山低了低头:“老段,别说了!你们去了……家里的事……我们照顾。”说完,向警卫连长挥挥手。

杨万林在边上平静地说:“(高蠡)暴动失败,没死在国民党手里,现在反动地主窃取了司法领导权,只好做了光荣的牺牲吧。”

段士增被押解着向外走去,仰天长叹:“这共产党真是大白天见了鬼了,放着敌人不杀,杀自己人!”



冀中领导人之一孟庆山

在冀中“肃托”过程中,河北游击军的一些干部、战士被杀害,如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人民自卫军的一些干部、战士也难幸免。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也被定为“托派”,押解到晋察冀军区处决。他这个“托派”又涉及到200多人。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冀中军区供给部长熊大正等人,“肃托”搞得人人自危。

二、“肃托”遭到抵制,贺龙喝令“急刹车”

冀中的“肃托”,还是受到了很多正直干部的抵制。1938年8月初,原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政委王平到冀中军区当政委,当天晚上,政治部的同志送来一批罪犯名单,说是明天要处决一批人,请他来签字。王平看了看,一共28个,据说都是“托派”汉奸。王平说:“我刚来,还不了解情况,怎么能随便批准处决人呢?”

政治部的同志说,说好明天要处决的,布告都贴出去了。

王平说:“那明天就暂不杀。”



贺龙和毛泽东、朱德欢送三五九旅南下

晚上,王平决定提审犯人,没想到,第一个竟然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问了被抓的原因,才知道是因为小偷小摸。后来又审查了“犯人”,没有一个和“托派”“汉奸”对上号的。最后,这28人全免除了死刑。

1938年11月起,敌人出动大量兵力向冀中围攻,冀中部队的整编还没有结束,战士们普遍缺乏作战经验,又受着“肃托”的严重干扰,形势就显得严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命令第120师冲破几道封锁线进入冀中,帮助巩固根据地。为统一领导冀中的斗争,党中央和北方分局决定,由第120师、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领导同志贺龙、吕正操、孟庆山等组成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贺龙实际上就成了冀中的“一把手。”

1939年1月,第120师主力5000余人从晋西和大青山分两路来到冀中。第120师是以红2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为基础改编的,红军老战士占了很大比例,战斗力非常强,师首长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都是我军著名战将。

1月25日,冀中军区领导吕正操、孟庆山等人在河间县惠伯口村迎来了第120师领导机关。吕正操、孟庆山敬礼后与贺龙握手,贺龙用力握住他们的手,风趣地说:你们冀中搞得不错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孟庆山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来冀中啊!他说

的是心里话。在延安时,他就认识了贺龙,知道贺龙对党忠诚、为人耿直,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贺龙来冀中,会使冀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都是红军干部,孟庆山几次与贺龙谈话,如实地汇报了冀中的问题,包括“肃托”问题。贺龙听着、听着,眉头皱起来。

原是东北军团长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见到贺龙,贺龙诚挚地和他谈了话。吕正操心里也

踏实了许多。第120师临来前,晋察冀军区曾给冀中军区政委王平发电报,(王平有一部电台直接与晋察冀军区联系,一些重要机密问题都通过这部电台收发。)尔后,晋察冀军区又发报给冀中军区。吕正操在司令部也收到电报,他对第120师来冀中发生了一点错觉,凌晨两三点钟来找王平,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个建议,贺龙师长来了,让他当冀中军区司令员。我是东北人,可以带支小部队去冀东,打回老家去。”经王平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冀中“肃托”问题,引起了贺龙极大关注,对于肃反扩大化,贺龙是深恶痛绝的,抗日战争前,他和战友们创建的湘鄂西苏区,就因为肃反,从创始人到营、团干部,几乎被全部杀光。好端端的根据地被断送,红军队伍被迫挥泪远走他乡,成为天涯孤旅。

到冀中后,有一天,贺龙在党政干部的陪同下到一个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被押着向村外走去。押解犯人的干部看见远处来了首长,赶紧催着犯人走。

犯人们也看出远处来的是首长,不知谁大声喊起来:“冤枉啊!我们冤枉……”

身披呢子军大衣、威风凛凛的贺龙听到了喊声,手中的拐棍扬了一下:“你们站住!”

押解干部不得已,命令犯人队伍站住。

贺龙走过去，问道：“这是干什么？”

押解干部赶忙走过来，笑着解释：“首长，这些是‘托派’，押出去处决。”

几个犯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冤枉，我们不是‘托派’，都是革命同志……”

贺龙问一个犯人：“你干什么了？”

“我给红军干部提意见，说他们从剧社里找媳妇，是‘拉女配’……”

贺龙皱皱眉头，用拐棍指指另一个犯人：“你？……”

那个犯人显然是个知识分子：“我给战士们讲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他们说我是攻击党，就定我个‘托派’……”

贺龙拿拐棍往地上狠狠一戳：“胡闹！肃反扩大化怎么又搞到冀中来了？马上给我停止。”

在冀中军政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贺龙再次提出，立即停止“肃托”，全力对付日军的“围攻”。他用这个借口，策略地停止“肃托”。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很快，监督“肃托”的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为“肃托”成立的临时机构撤销了，冀中的“肃托”在贺龙的干预下来了个“急刹车”，这个“急刹车”挽救了许许多多革命同志的性命。

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建国后，段士增的儿子拿着请求为父亲冤案平反的材料，找到河北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请孟庆山为冤案作证明。孟庆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他留下的材料转到有关部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孟庆山曾想为这些冤案昭雪，他流着泪为杨万林的儿子写了证明材料，承认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1959年，他去北京看望已经担任中央部长的黄敬，见到了到北京上访的杨万林的儿子。黄敬把杨万林的儿子送出门，回来后对孟庆山夫妇说：段士增、杨万林应该平反，这是一个冤案。

建国后，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孟庆山是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还担任河北省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委副主任，因工作关系，他多次与贺龙元帅接触，贺龙也十分珍视他与孟庆山在冀中时期结下的战斗友情。孟庆山去北京看望贺龙元帅

时，两人促膝长谈，元帅深情地谈到，第120师在冀中转战半年多，扩军5000多人，冀中人民和冀中军区给予第120师很大帮助。孟庆山则谈到，120师平息叛乱的独立第二支队，齐会战斗重创日军“扫荡”队伍，稳定了冀中形势。谈着谈着，孟庆山谈到冀中“肃托”问题，元帅默默无语，屋里一阵寂静。要解决历史上的这些重大问题，是贺龙元帅力所不能及的。

党中央也在反思，历史上的很多事情，终于用血的教训弄明白了。1979年9月，在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结束政治运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事实证明，政治运动发动容易，把握难。时常一搞就过火，经常会伤害好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段士增儿子的一份要求为父亲平反的材料，辗转到了我手里，我也曾经为他们上转材料，并给他们出主意。

冀中在“肃托”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到1983年后，都陆续平反，有的还建起了纪念碑。如段士增、杨万林等冤案平反后，河北省高阳县为他们立碑，以志纪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国期刊协会主办





名篇佳作 一网打尽

栏目

纪实 观察 非常话题 浮世绘 人间故事
往事 生存智慧 历史讲义 深度阅读 揭秘
自由谈 新聊斋 作品 拍案惊奇 自然与人

每期一篇大稿(8页):最新事件、人物、书摘、刑案、小说,可读性极强。

邮发代号:82—619 每册定价:3.90元 电话:65237095

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 刘仰东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闭幕，由44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关向应和林枫两人为东北籍中央委员。关向应是大连金县人，林枫的家乡则远在位于黑龙江省腹地的望奎县。林枫的当选，在颇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的表象背后，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来自并不得风气之先的边远地区的共产党员，在近二十年革命生涯中对党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建国后，林枫曾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今年正值建党

八十五周年，也逢林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七一”前夕的一个下午，林枫之子、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吉林大厦向笔者追溯了父亲一生中的若干片段，从中可见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的政治智慧、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领导“一二·九”运动

林枫于1927年3月经范文澜介绍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他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直接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林炎志告诉笔者，母亲郭明秋（中共党员）当时是北平学联主席，经常冲在前阵，父亲则作为市委书记，运筹帷幄，此前两人并不认识。尽管在



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时的林枫

“一二·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不乏中共党员，“学联”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层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模棱两可者有之，不赞同甚而反对者也有之。林炎志说，父亲的态度很鲜明，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党应当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市委书记，他通过与“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的直接联系，及时把握运动方向，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具有全国意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当时的“学联”党团书记

姚依林后来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

1935年12月下旬，林枫代表北平市委和黄敬、彭涛等人商定，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宣传团于1936年元旦过后成行，虽然前后不过十来天，只到了保定周边的几个地方，但意义却非同寻常。林炎志说，当年在北平念书的大学生，多非劳动家庭出身，平时很少接触工农群众，更缺乏对底层生活状况的切身体验。母亲郭明秋曾回忆说，不少女学生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下

乡的,起初叫苦连天,但艰苦的乡村生活最终教育了他们,触及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位参加宣传团的同学写信给上海《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十二天的农村生活,精神上的热火压灭了一切冻和饿的进攻,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知识,这知识是我们在教室里和书本上所永远找不到的。回来的人都说:‘我们十二天的收获,比读一年的书强的多。’”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枫和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向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刘少奇也曾指出:“‘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林枫就向北平市委提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1936年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全部返回北平后,林枫又与姚依林、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大学学生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取名清华民先队,林枫指定黄敬为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为民先队长。随后,又成立了范围更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著名的“民先队”组织。

1936年1月底,各大中学临近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地罢课,而应当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曾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是不是回去参加考试?”林枫回答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北平学联根据林枫的意见,开会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为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复课宣言》。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迫害,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林枫根据形势的变化,立即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将已经引起当局注意的学运骨干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国民

党当局的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林枫的建议,从北平抽调一批干部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

1936年3月,林枫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5月出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这年夏天,他与郭明秋结为伴侣。他在北平尽管只工作了短短的三个来月,但作为市委书记,他直接参与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其意义之长远,已经超过了三年、三十年……大批进步学生通过“一二·九”运动,逐渐成长起来,最终投身革命事业。谈到这里,林炎志引了毛泽东几年后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演中的一段话:“‘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林炎志认为,其中的“干部准备”就党迫在眉睫的事业而言,是最“实惠”的。他举例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有时一下让出几十个县,不断形成权力真空地区。为充实敌后工作,中共面临着大量德才兼备干部的需求。而通过“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之路的大批知识青年中,有数万名干部被输送到敌后,成为党建立根据地的宝贵财富,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战而言,实可谓一种“久旱逢甘雨”的政治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一二·九”运动造就的一批干部在各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林炎志曾长期从事学生和青年团工作,作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后人,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是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爆发游行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黄河赈济会为代表的发动、酝酿、准备时期;第二阶段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上街游行;第三阶段是全国学生青年走向工农群众,走向共产党,走向根据地的时期,前后达两三年。“一二·九”运动最生动的高潮虽然在第二阶段,但其历史作用的关键在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之后的与工农相结合,与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结合。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个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核心,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林炎志就近几年社会上针对“一二·九”运动的某些看法谈到,“一二·九”之前,由于中共地下党被几次破坏,一直处于高度隐蔽的秘密工作状

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是许多当事者及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作用的重要原因。甚至形成了一些舆论,认为“一二·九”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林炎志说,“一二·九”运动当然有自发性。所有群众运动,都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哪里有群众性。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所有群众运动能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都与共产党的领导相关。有人说,查不着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更是反映了这种认识的误区。中国共产党由于承担的历史使命非常艰巨,所面对的环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复杂的环境。所有这些都造成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是人类政党史上空前多样,空前生动的。党的领导形式今后必然还会发展,还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党的领导已经与中国历史必由之路相结合,已经成为客观之必然,尤其是青年运动之必然。

决断“晋西事变”

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林枫任山西省委书记兼北方局组织部长。193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驻扎石楼县圪堵坪。11月,八路军115师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115师独立第一支队,林枫兼政治委员,陈士榘为支队长,在晋西坚持抗战。

不久,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制造摩擦,预谋挑起针对中共的武装冲突。1939年4月,阎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反动方针,取消新军中的中共组织和政委制,“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并对其骨干说:“天要下雨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要快准备雨伞。”晋西南地区成为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形势不断恶化。1939年9月,中央电召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形势。林枫日夜兼程,赶到延安后,与毛泽东交谈了两次,林枫问毛泽东:“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后由林枫、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在《解放》杂志发表了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目前危险倾向宣言。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11月上旬,林枫从延安回

到晋西南区党委驻地时,形势已相当紧张。林枫在区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讨论了反对顽固派斗争的方针。晋西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此采取不再让步,必要时不惜武装自卫的方针。

1939年12月,阎锡山首先向晋西地区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并提出“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口号,来势汹汹,根据地局势更为吃紧。12月6日,在林枫主持下,晋西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判定被动势必吃亏,果断决定要主动地武装自卫,“眼明手快,先下手为强”。同时决定在晋西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12月9日,我军开始行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号令下,部队一部分就地作战,主力部队分两路出击。据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回忆:“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在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20天、我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之后,为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由林枫率领部队和党委机关干部转移到晋西北,与那里的新军、八路军会合。

晋西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一再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党内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林炎志告诉笔者,毛泽东事后也曾问父亲:“谁打的第一枪?”父亲直言:“是我打的第一枪。不打第一枪,就没有机会打第二枪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还重提此事,并当众表扬了林枫。林枫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但在不利的军事环境下,仍能果断决定主动出击,避免了另一个皖南事变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

最后十年

林枫的最后十年(1967—1977)与“文革”几乎同步。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受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没能等到自己的冤案彻底平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文革”开始时,林枫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1966年8月,林枫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中央党校,“猛攻”他的大字报便扑面而来。康生亲自操纵了对林枫的批判,他或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及造反派头头,或派人到党校活动,他发出了一道道针对林枫的“批判指令”:“要彻底揭发、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林枫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康生还利用造反派盗用群众名义写的一个报告,亲自向中央提议撤销林枫的职务。

在这种局面下,林枫被戴上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等一顶顶帽子。林炎志回忆说,即使落到这样不公的境地,父亲依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在已被“监督”起来的1966年12月,他还写信叮嘱子女:“高级干部子弟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在政治上有优越感,这是害人的,这是我很久以来担心的,你们要跳出这个害人的圈圈。”12月14日和18日,林枫两次被押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会场,和他一起被斗的分别是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和彭真、刘仁、万里等人。在有几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林枫被逼迫低头下跪,横遭拳打脚踢,但他硬是不肯弯腰。18日的批斗会,林枫在坐“喷气式”时不断挣扎着直起腰,昂起头,以至激怒了丧失理性的打手,他肋骨被打断,左臂被打骨折,内脏被打出血。寒冬腊月,林枫的鞋被踢飞,夹衣被扯开,他就这样袒露着胸膛被拖着“游场”,最终昏倒在批斗会场。事后提起此事,林枫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

此后一年多,林枫被监禁在万寿路罗道庄的一个兵营里,不时接受造反派的审讯。1968年3月,他被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不论是监禁还是下狱,林枫的气节和人格始终不变,没有在逼供的压力下伤害过一个同志。一些和林枫“同案”受迫害的同志,在“文革”结束后曾对林枫的亲属说:“从专案组的审讯、问话中,我们就能知道林枫同志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实际的话。”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8月4日上午,林枫的子女获准到监狱探视离别六年的父亲。当父亲

蹒跚走来时,林炎志姐弟几人都惊呆了,父亲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们后来在《我们的爸爸》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他变得太多了!他体重掉了四十多斤,瘦得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腰和腿都直不起来了;他的眼睛灰蒙蒙的……他怎能不变呢?!四年中,他只见过不足二十四小时的阳光;一碗米能洗出一碗底沙子,他吃不饱,他染上了肺结核并出现肺空洞,还得给别的犯人倒屎倒尿,在那条一穿就是半年的黑棉裤上,留下一层白霜,他的糖尿病已经加重了……

他的模样变了,可是他的精神没有变。就在这一天,他极为激动地打着手势说:“毛主席有一句话是‘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年我就是靠这点精神过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林树乐。人家有‘八段锦’,我给自己编了‘三段锦’,每天坚持做。”爸爸是个含而不露的人,举止素来沉稳老成。他如此激动,我们还从未见过。后来他告诉我们,那一天他回到牢房,一直坐在铺板上,忘记了吃午饭,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被喊“醒”。

这次探监后的第二天,林家子女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对重病在身的父亲进行抢救。8月11日毛泽东看到信的当天即亲笔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这样,林枫才得以出狱,从秦城监狱被直接送进阜外医院,但仍不给作结论,不给恢复党籍,生活上也无人过问。此后五年,林枫一直住在医院,连家也没回过。有一次去协和医院做检查,医生特地请司机绕道天安门广场,这是林枫生命最后的十一年中惟一的一次“出门”。

尽管身体已经坏到极点,身在医院,党籍的恢复也遥遥无期,但林枫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国家大事,没有一天不在关注时局。1975年,他对已恢复工作前来看他的老同志说:“小平同志是要斗争的,你们要支持他工作,他缺帮手啊!”1976年4月5日傍晚,从天安门广场赶回医院的子女向他讲起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刚听了个开头,他就自己挣扎着起来,一直用手臂支在双膝上,直板板坐着听完子女活灵活现的描述,可见他忧国之心之重。以后,时局更加复杂,“四人帮”猖獗一时,林枫再三叮嘱子女:“条件恶劣起来,你们可以不说话,



上世纪 70 年代 ,林枫与家人合影于北京阜外医院

但是不能跟着说 ! ”有位老同志去医院看他时说 : “ 外面都说中国又要出女皇帝了。 ” 林枫断然答道 : “ 现在的中国 , 不会出女皇帝 , 没那个条件 ! ”

在阜外医院许多有正义感的、善良的医护人员及工人的尽心治疗和护理下 , 林枫垂危的生命得以延长五年 , 但他到底没能等来自己的彻底平反。 1977 年 9 月 29 日 , 林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信念与操守

林炎志特别提到了父亲作为职业革命家终身不移的坚定信念。林枫 1927 年 3 月入党不久 , 大革命就失败了。各地党组织或遭到破坏 , 或转入地下。不少共产党员因此脱党 , 林枫也一度失去和组织的联系。他虽身离组织 , 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 为寻找党组织 , 他曾奔走于平、津、沪、汉等城市及河北、山西、江苏、浙江等地 , 虽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 但他从不气馁 , 同时自觉地从事党的活动。 1930 年 , 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的林枫通过赖若愚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 并担任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多年后 , 他曾对妻子郭明秋说 : “ 我在 1927 年入党 , 入党前就经历了各种思想斗争 , 所以 , 我走共产主义这条路 , 是有思想基础的。 ” “ 文革 ” 中林枫受到残酷迫害时 , 曾几次对子女感叹道 : “ 这个党 , 我是自己找上门来

的呀 ! ” 即使失去党籍 , 他的信念却依然不改。家里的书被没收了 , 没有工资收入 , 他就叫女儿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 , 并说 : 将来有了钱 , 还要买他们的全集。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 , 一生喜爱读书。晚年病情恶化后 , 他还对妻子郭明秋说 : “ 我不能看书了 , 可是也要买呀 , 闻闻书香也是好的 ! 咱们给孩子们没有什么遗产 , 就是留下这些书。 ”

出狱后的林枫发生过心力衰竭 , 并患有白内障、神经炎引起手指麻木等多种疾病 ,

写字已相当吃力 , 可他仍抱病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扉页上一笔一画地给子女写了这样一段话 :

京京、星星 , 你们先读这本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 将来还要看他们的全部书信集。至于炎炎 , 可以先看马恩全集 , 也可以先看此书。我希望我们的青年都能读马恩的书信。这些书信很有趣地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 , 不但生动易懂 , 而且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

林枫的人格魅力 , 不仅体现于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 无论事业辉煌还是身处逆境 , 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 还体现在他的个人道德操守上。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抗战以前 , 他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 , 他以极强的亲和力 , 把一大批上层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 为党在白区的事业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 , 当时的北大教授张柏园 , 月入百余大洋 , 一次发工资时 , 林枫去向他要钱 , 先拿了几块 , 又回过头来再拿几块 , 如是反复多次 , 直至自己手里的钱超过了张柏园手里的 , 张不得不说 : “ 你还真能拿呀 ! ” 张柏园自然明白林枫向他要钱 , 用途并非贴补或改善自己的生活 , 而是为了从事革命活动。在白区工作 , 环境自然相当险恶 , 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林枫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 却从未被捕过 , 并非他未遇险情 , 而是每到紧要关头 ,

总会有一些“有能量”的人物主动出来保护他,这些人也明知道林枫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受到党外人士普遍欢迎并能赢得他们敬重的共产党人。

林炎志还谈到,父亲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同样以高标准的道德修养自律。他的能容人、“海量”、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都是熟悉他的老同志所经常提到的。他与高岗、林彪、康生在工作中都发生过意见分歧,始终以既不丧失原则,又不破坏团结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斗争。

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时,把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视为异己,用宗派的态度对其进行排斥,甚至在公开场合指桑骂槐地打击他,致使林枫处境很困难,周围一些同志对此也有朦胧的感觉,但林枫从来不说什么。直至几年后中央揭开高岗的问题,大家才恍然大悟。一位随林枫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高岗问题的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开会期间,中央发给林枫的文件,都注明本人亲收,不准秘书代领。因而随员始终也不清楚会议的主题,直到会议结束,乘火车返回沈阳时,林枫才告诉他:“高岗犯了错误。”当时任林枫秘书的李之琏曾回忆说:

东北解放初期,东北工作的各项重大方针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的,但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存在着分歧的。林枫同志是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对这些分歧是清楚的,但他从来不向下级人员透露。我作为他的秘书和组织部的一个负责干部,除了从中央和东北局来往的电报中了解一点情况外,林枫同志从来不透露只字。有时我看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向他提出疑问,凡是涉及到领导人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他从来不作正面答复。希望他能有所解释时,他只以“有争论”三字简单答

复我。

林枫晚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始终默默忍受,对同志对家人,都没有丝毫流露,以至后来当查证他是如何受迫害被打伤的情况时,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阜外医院治疗期间,许多人去看望,他也从不提及自己所受的种种折磨,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埋怨情绪。整个“文革”期间,他很清楚当时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但他宁愿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态度对待自己不公的境遇。他自信党最终能够明辨是非,战胜邪恶,让真理重放光辉。林枫被监禁期间,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眼前的运动不理解,问他许多高级干部当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都闯过来了,这场运动中为什么一下子成了走资派?林枫很肯定地回答他:“这些到运动的后期,党中央、毛主席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的。恐怕还得再来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这句话的预见性。晚年尚未平反时,子女曾劝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他则一再拒绝子女的劝说,坚持不写回忆录,并说:写回忆录难免自我吹嘘。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颠倒了的历史终归又被颠倒回来。197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林枫同志的复查结论》,对林枫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批复同意。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林枫同志入党时间问题的通知》,认定“林枫同志是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 萧徐)

欢迎订阅 2007 安徽老年报 邮发代号 25-42

▲ 一版 新闻言论

▲ 二版 卫生保健

▲ 三版 《枫林》副刊

▲ 四版 综合

▲ 月末的生活版

本报是安徽省唯一的老年人报纸,曾被省评为一级报纸、编校质量为先进单位,广告发布诚信单位。

报小信息多 文韬品位高 惠而不费

《安徽老年报》,老人的需要,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安徽老年报》,中青年的需要,增加知识,开阔眼界,展示时代风貌,学习两代情感,关注老年人生活。 《安徽老年报》,关注老年人,关注为自己也为自己孩子的生活,关注一切家庭。

何孟雄——迭经坎坷的骁将

● 李永玲

党的“六大”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同李立三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们的“第一把火”便烧向江苏省委。因为“六大”确定的干部路线是将工人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向忠发，这位武汉工人也就是按这一选拔思想而为共产国际相中上台的），照此，当时江苏省委是不符合要求的。于是，向、李决定改组省委，拟派广东工人、新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对此，江苏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省委负责人何孟雄认为这样改组是不妥当的。李富春等常委同意何孟雄的意见。

1928年12月，上海法电水公司工人举行罢工，向忠发主持的中央决定把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和江苏省委合并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罢工。中央将江苏省委和“行委”合并的做法，引起何孟雄等江苏省委同志的不满，他们认为“行动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何孟雄还认为中央25号通告的政治路线是盲动主义的。他甚至还建议，目前上海法电水公司工人不要急于罢工。后来，罢工失败，向忠发把愤怒洒向李富春、何孟雄领导的江苏省委，感到改组江苏省委已经迫在眉睫。于是通过决定，撤销江苏省委，由中央兼任。

江苏省委闻知中央将兼任省委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上海各区委书记会议，传达省委与中央纠纷的经过，公开表示不能同意中央兼任省委的决定。向忠发闻讯后，大为恼火，停止江苏省委职权，命令各种组织不准与江苏省委发生关系。江苏省委也不示弱，公开与中央“顶牛”，拒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各区巡视，通知所属各级党部转移，不

让中央知道新址，还表示要派代表到共产国际去申诉，并于1929年1月20日，向中央递交了省委对中央工作的书面意见。

随后，李立三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指责江苏省委“非组织行动，离开了政治路线”。向忠发则认为“江苏省委负责同志此次行动犯了严重的错误”。为此，中央开会决定将中共江苏省委解散，给何孟雄以警告处分，降职到沪西区任区委书记。

“江苏问题”终于以组织手段解决了，何孟雄背着处分去沪西区委任职。

江苏省委解散后，何孟雄先后在沪西区、沪东区和沪中区任区委书记。基层第一线的实际工作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示威和集会，造成了革命力量一批批被逮捕和杀害。于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何孟雄便不畏打击，率先起来反李立三“左”倾错误。斗争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尖锐化。

1929年11月18—26日，中共江苏省委“二大”在上海市龙华路外日晖桥的泉漳中学召开，何孟雄以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身份与会。大会首先由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来临，对敌斗争策略上，要采取进攻路线，党内在反取消派的同时，必须反对右倾保守。

当大会转入讨论后，何孟雄两次发言，公开表示不能同意报告意见，他慷慨陈辞，认为：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开始走向复兴，反动统治尚未崩溃，而是处在动摇之中；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是准备进攻路线，所以，要注意主观力量的准备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不

是无条件地进行全面进攻。何孟雄的发言惹恼了李立三，于是李立三便组织大会转向对何孟雄的批判，并多次点名斗争何孟雄，指斥何是“调和派路线”，给何扣上“反共产国际”、“反对中央”的帽子。

何孟雄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未果。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纪，他表示服从决议，要求保留个人意见。

会议结束了，何孟雄因反“左”而被戴上了“调和派”帽子。此时此刻的他真正陷入人生的逆境。政治上、情感上的双重打击几乎同时发生。就在一个月前，与何孟雄情投意合、始终并肩战斗的人生伴侣缪伯英——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因患伤寒病逝在上海宝隆医院。何孟雄甚至还没来得及医治因爱妻病逝而受到伤害的心灵，便单枪匹马地投入到与敌人、与党内“左”倾错误的两个战场上去战斗。因为他铭记并要实现缪伯英“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的临终遗言。

三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这个文件标志着“立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头脑发热的李立三要发动全国总暴动，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愿。

李立三空想的暴动计划，遭到了何孟雄的积极抵制。当“立三路线”在党内形成后，何孟雄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批判和抵制，他先后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系会上批判过“立三路线”，阐述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9月1日，李立三主持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何孟雄在会上要求停止武汉、南京、镇江的暴动，提出党内存在一条“立三同志的路线”，“再执行下去会葬送中国革命”。何孟雄的发言一针见血，李立三当场禁止何继续发言，并宣布何孟雄是“取消派的暗探”。

9月4日，在中央建议下，江苏总行委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一周后，专门召开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批判何孟雄的“调和主义路线”。与此同时，《红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反

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暗探作用》等社论文章。

何孟雄以坚强的毅力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和自己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归纳为十二个方面，写成《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于1930年9月8日递交总行委、中央政治局。（1931年1月6日，中央秘书处单独印发何孟雄文件时编号为“第一次政治意见书”。）意见书直率地批评中央及省委某些领导人那种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忽视现实问题，使斗争不能发展的错误策略。

四

1930年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专门为解决“立三问题”而召开的。

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撤销了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李也因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但是向忠发仍是中央总书记，他在政治报告中把打倒何孟雄的“调和派”和陈独秀的取消派并列为党的二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两大成就”，号召全党向何孟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斗争”。会后中央发表“告同志书”，公开点名批判了“江苏何孟雄”。

在中央批判何孟雄的强大压力下，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在不许何孟雄参加的情况下，撤销了何孟雄“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职务。

被撤了职的何孟雄为自己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而痛苦，但他没有消沉，不久，又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政治意见书”，还几次向政治局写信，表示“坚决与立三路线尤其是三中全会路线及调和倾向作斗争”。

六届三中全会对待何孟雄反“立三路线”的不公正处理甚至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反感，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指出何孟雄是“假的右倾”。为此，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十月指示信”。

193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基本肯定了何孟雄反“立三

路线”的意见是正确的，承认“给何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决定未能得到贯彻。不久，王明上台，何孟雄面对着更为“理论化”的“左”倾错误和新的打击。

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策划操纵下召开。会议一开始就不正常状态，至最后选举，争吵尤烈。米夫提出了事前圈定的包括补选王明、沈泽民为中央委员及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名单，要求全会通过。至此，何孟雄明白，这次会议不可能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只不过是为由米夫培植的极“左”代表王明上台提供一个合法程序。会上，何孟雄发言，要求中央说明王明在上海被捕与泄露秘密机关的经过，用以抵制王明上台，何的要求被米夫制止。何孟雄对米夫、王明破坏党章、违反党内民主的丑恶表演深表愤慨。会后，他指出六届四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参加了反王明新“左”倾的斗争。

面对会后党内的反四中全会和王明的声浪，王明不便直接出面，于是由米夫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要求他们支持四中全会、支持王

（上接80页）是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个亿的资产。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农民需要劳动空间，劳动自由，有了劳动空间和劳动自由就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农村有能人，不乏能人，就是缺乏一个劳动空间。另外一个体会是，小钱在生产领域，靠种植粮食、养鸡养猪发不了财；大钱在流通服务领域，比如教育、金融、医疗这些部门。巨大的财富蕴藏在第三产业里，而第三产业正是我们国家发展最欠缺的地方。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富有的地方，只有消费财富的地方，才是最富有的地方。比如北京，它并没有许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它是第三产业，是消费的地

明。当何孟雄表示不能接受他的意见时，米夫竟威胁说要给何处分，开除其党籍。

此后，王明主持通过《告全体同志书》，公开点名批判了何孟雄，他还亲自布置批判何孟雄，诬蔑何孟雄是“右派”、“反党分子”、“老机会主义者”……

正当何孟雄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不屈斗争时，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不幸被捕。从南京派来的国民党官员试图引诱何自供：“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何孟雄就一口回绝：“我反对立三路线，就是要打倒你们！”碰壁后的劝降者用嘲笑的口气对何孟雄说：“你死后，共产党给你什么处分？”意图挑拨何孟雄与党的关系，再次遭到何的回绝。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在上海龙华慷慨就义。王明不但没组织任何悼念活动，反而表示对何孟雄等人的错误要彻底清算。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关何孟雄反“左”历史和评价，这样写道：“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方，但也是最富有的地方。国家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很好，“少取”已经不取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但是搞活、放活是非常难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已经法制化甚至私人化了，这是我们国家进一步改革清障的难点，也是重点。

我喜欢《炎黄春秋》，喜欢她反思历史，喜欢她关注现实，喜欢她和时代的脉搏、现实的脉搏在跳动。我打算多订几本，给董事会成员人手一册。我还想收集几套《炎黄春秋》15年以来的合订本，放在大午中学图书馆里和集团职工图书室里，让大家来学习，来和她一起反思。



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这是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次访苏，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也跟着去了一名工作人员，就是早我一年分配来的同学何祚庥。那时强调学习苏联，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也是以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为模本，但是又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以及临时性的东西。比如，不是选举，而是请国内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推荐或向他们征求意见，由郭沫若院长聘任；不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人数比较多一些，学科范围比较广一些，有些学部委员学术成就现在可能还不够高，但现实中那个学科很需要发展，也聘任了一些。这几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同时，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这中间的继承性，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主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

陆定一不当 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

● 龚育之

学部委员。这就是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学成就入选的。（还有一位马寅初，以经济学家身份入选，当时他已转到亲共的立场。）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位亲共学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要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但是，哪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可以和应该聘任为学部委员呢？

近来读了一些网上和报上讲那次学部委员聘任情况的文章，从中得到两个重要的资料线索。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录，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的日记。

张稼夫的回忆录中关于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事，是这样说的：

“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

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杨尚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
①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这两段史料，特别是杨尚昆日记这段史料，非常重要。

中宣部和科学院内的党员同志对政治局这个指示是不是没有执行，是不是有所抵制，我觉得认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比中共高层更“左”，所以没有执行高层指示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和学术界中有很高的地位，一九五五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很多，这是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共产党内的，也有共产党外的。党内的许多来自延安，也并不都是来自延安“中央研究院”，还有并非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延安人士。有些则来自其他根据地，还有不少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党外的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也不少，他们大都表示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历史学家陈寅恪。

这里对于全国的和中国科学院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的情况，不多作论述，单说说中宣部里的情况。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

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

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这五人官大，要管科学，就让他们当学部委员呢？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当时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当时也有较大的共识。陈伯达写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中国四大家族》、《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胡乔木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写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于光远当时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高潮中的翘楚。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强调政治性比起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这样的人，能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人吗？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谈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中宣部长陆

定一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观点，或者是个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学部委员制度建立后，一九五七年增补过一次。社会上对这个学术称号看得很重。郭沫若说，全国人大代表（也许是全国人大常委？）每月车马费五十元，学部委员车马费应该更高，每月一百元！（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机关干部每月工资不过六七十元。）后来，因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增补的事不再提了。但有过一次例外：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要求中国赠予他院士称号，当时中国没有院士称号，只有学部委员称号，赠予艾地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时，正式规定：学部委员外文即译成院士。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又行增补，后来改称院士，并且多次增选。中国工程院成立，也建立了院士制度，也已多次增选。只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没有改称，也没有增选。去年庆祝学部成立五十年，《科学时报》发了一大版照片，共登了一九五五年成立学部的时候，担任学部委员的二百三十三人中至今仍在世的自然科学家十六人，最年长的贝时璋一百零二岁，最年轻的黄昆八十六岁（他不久就去世了），社会科学家四人，最年长的薛暮桥一百零一岁（他也随即去世），最年轻的于光远九十岁。

社会科学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至今还是悬案。有些同志主张社会科学方面不要评院士。这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却带来一个大问题，即似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处在非常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化。既然南京时代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已有自然科学方面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也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为什么到了现在，社会科学方面反而不能建立院士制度呢？据我所知，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科学院还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建立院士制度的时候，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力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设立院士，并曾致信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方毅和李昌，表示：“希望学部会议

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思考虑。”后来，中央又曾决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当时社科院曾积极研究，还曾向我（时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征求意见。我在原则上是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的。但社会科学方面选院士，的确麻烦很多。说白了，就是许多党政领导是否选为院士。我当时的建议是：第一，社会科学方面应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一样，推选院士。第二，绕开难点，开始的时候，先把党政领导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仅从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从事科学的专业人士中遴选，不是党政领导人中没有人够资格担任院士，而是以后条件成熟再考虑这两大系统之外的人士。第三，就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来的学部委员为选举人。这部分学部委员当时在世的还剩十来个吧，依照自然科学方面的先例，先把这些人确认为院士，再由这些院士推选新增的院士。我认为，按这三条办，社会科学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工作就可以启动了。

我这个建议，就是从一九五五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不当学部委员的范例，得到启发而形成的。

不过，当时社科院研究院士问题的结果，因为领导同志不听汇报，就被搁置起来了。搁置到现在，我那个建议已经失去意义，因为还在世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只存三人，都已九十岁以上，没法由他们三人来推选别人为院士了。

近来，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人民日报》上发表消息，说是建立“院士”制度，虽然打了引号，读者多半还是当它就是院士制度。对此，我有两项建议：第一，依照陆定一的先例，党政高官先不做院士候选人；第二，不能只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可以考虑先在全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两个系统内进行推选。如果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推选，那么，各高等学校呢，各地的社会科学院呢？只让一家搞，恐怕不行，难以服众；各家搞各家，则一定一塌糊涂，必将使院士的学术威望大贬值、谋取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大泛滥！（责任编辑 萧徐）

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 解力夫



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同志于1976年7月6日去世了。在治丧期间,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大姐怀着悲痛的心情,应笔者的要求向我讲述了朱德同志历经磨难探索救国之道,追求真理,叱咤风云,为国为民奋斗的光辉一生。

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路茫茫,黑夜长,前途在哪里?为什么中国革命一直遭受挫折?”当时身为滇军旅长的朱德将军,怀着忧国忧民的焦急心情,辞去了滇军旅长的职务,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回川担任师长的邀请,外出考察,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

他首先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和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时,这位56岁的孙文已经在革命征途上度过了37个春秋,虽然屡遭失败,但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希望入党之后,可以从此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要求遭到拒绝。陈独秀

看着来客,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滇军的将军。他不理解,一个有着优厚待遇的将军,为什么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问题,默默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中共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德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绝望之余,他于1922年9月初,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

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土地上,去欧洲这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探寻拯救国家的秘密。

朱德和他的同伴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些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叫周恩来的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周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朱德迫不及待,他和孙炳文坐上火车,于1922年10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的英俊青年,两眼闪着光辉,严肃而聪慧。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周恩来举止优雅,落落大方,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

了，两个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守秘密。从此，朱德卸下了包袱，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时间完全放在学习上。除学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是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有一个年轻同志帮他学习。他们学习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共产主义入门书籍。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细读《向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登载关于中国革命的学习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党组织分析了中国以往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学习德文，以便进入某个德国大学。1923年年初，朱德离开柏林，进入戈丁根大学政治系。1924年初，当朱德离开戈丁根大学回到柏林，着手把在德国的全体中国人组织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新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下的时候，血染中国山河的激烈的北伐战争正在孕育之中。这时周恩来、孙炳文及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广州。在孙中山首创、而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届时，中国的农工运动也在兴起，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开始了。面对着如火如荼的斗争，朱德心潮澎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心回到祖国参加这一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

朱德一回到中国，就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在革命的风暴中，在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无论顺境和逆境，他始终和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一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三军副军长。1928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发动了湖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任军长。从此，朱德就在毛泽东领导下为革命军队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红军长征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为扭转中国的乾坤，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战，横扫了上千万的反动军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德的名字也像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成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德可谓共和国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元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他们煽动造反派攻击和诬蔑朱德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同时还散布“批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朱德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是这个党的“主席”。朱德看过后，鄙夷地骂道：“纯粹是造谣！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襟怀坦荡的陈毅也对林彪集团造谣惑众、篡党夺权的阴谋十分气愤，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位与朱德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声！

然而就在这时，朱老总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同志，也多次被造反派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的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逝世报道

康克清愤怒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从来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会师的？”

“不！这不是事实！”康克清摇摇头说，“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湖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你不老实，你攻击林副主席没有好下场！”打手们叫嚷起来。

“九大”之后，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且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形势进一步逆转，朱德和一批老帅，以“战备”名义被勒令离开北京，朱德来到广东从化，名义上去“疗养”，实际上失去行动自由，被软禁起来。直到1971年9·13事件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朱德重新回到了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热情地握着阔别日久的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听了这些话，朱德同志流泪了。这是他多年第一次流泪啊！

但是，为时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发动了“批林批孔”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和老帅们，更为让人揪心的是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竟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啊！恩来您在哪里？”他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五十四年，失去推心置腹的老战友，是他一生遇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来到北京医院。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

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从此之后，朱德元帅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1日那天，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老总躺在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在他离开人世的最后几天，一直不能入睡，总在思念着我们的党，和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满目疮痍的国家。

他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国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想法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千万不要放松抓生产，要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立足之本呀！我好了还要工作，要革命到底！”这就是朱德同志最后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嘱托。

朱德元帅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安街，含着热泪送着灵车西去。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十年后，1986年12月，朱德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本刊说明

我刊今年第9期《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一文的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的原标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段历史——1946年2月中国学生“反苏”游行的前前后后》。作者没有参加这次游行。

本期第62页左栏倒数第4行“去除倭寇”原稿为“去除大害”。

谨此说明，并向上述两文的作者致歉。

李庄和我在动乱年月的一段经历

● 袁 鹰

李庄同志久病之后离世远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都沉浸在浓重的哀伤中。他那忠厚正直的高风亮节、严谨勤恳的工作作风和上百万字的文章,连同那冀中口音的言谈笑语,都留在我们心头。我尤其多次想起十年劫难中同他那段特殊的共同经历。

大动乱的第二年,1967年8月,我正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每天打扫印刷厂办公楼的卫生,随时还要回部门接受批判。有一天下午接到通知,说即日起改到搬运组参加劳动。说来惭愧,我在报社工作十多年,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门。到报社后院找到搬运组报到时,当天的活已干完了,只有组长苏春义和副组长冯泽东还没有走。老冯问我住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宿舍,就问:“八点以前能赶到吗?”我连忙点头说“可以可以!”

第二天早晨,我七时半就赶到搬运组,师傅们大都已经上班,有的正在吃带来的早点,有的正在换劳动服。我抬头一望,靠里墙坐着比我早来几个月的李庄。他已经换好衣服,正翻着刚出版的当天报纸。我悄悄坐到他身边,他侧头一看是我,竟在此处相逢,有点意外,却不便说什么,只是点头致意。我轻声问这搬运组是干什么的,他简单回答是去西直门车站拉卷筒纸回来印报。正说着,老冯递过来一套旧劳动服,我赶快换上,跟在李庄后边,同全组师傅们一起去车队,爬上大卡车,直奔西直门货运站。

“一月风暴”引起的“夺权”恶潮,还在到处泛滥,神州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一片混乱。北京街头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去西直门途中,我们两个并肩坐在大卡车上。虽然都在报社,每天都到大楼来,但是动乱时日,却也不常见面,只是前些天在造反派揪斗彭老总的大会上见过。说到那次荒唐的揪斗,那令人悲愤而又胆战心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几十年出生入死,为缔造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功勋卓著的开国元戎,竟被诬蔑为“反党野心家”,真是从何说起!更叫人惶惑不解的是:彭老总同人民日报社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像前几个月刚被拉来批斗的胡乔木,领导人民日报社多年,为什么竟然也会拉到报社来批斗?这样一位名震中外的元帅,能随意想揪就揪,说斗就斗吗?那天五楼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气氛激烈,人们实际上都想来看一看景仰已久的彭大将军,未必会关心“批斗会”的内容。我们这类人照例充当陪斗角色,心里都有难以言宣的郁愤。我正站在李庄身旁,只见他脸色阴沉,紧咬嘴唇,呼吸有点急促。他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前线,都曾在这位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麾下,亲聆训诲,怎会想到今天竟低头站在台下充当陪斗!彭大将军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威武不屈,目光炯炯,只用简单的言语回答迎面泼来的污水:“我没有反党,更没有反对毛主席。工作中的错误,我已经向中央检查过。”“有的事情,涉及党内机密,我不能说!”然后就一言不发,用沉默蔑视接连抛来的诬陷和污辱,直到终场。卡车上提起此事,李庄仍然心潮起伏,激愤难平,仿佛又回到那天会场上。

在搬运组每天来回四次推大纸,有时还去广安门外马连道纸库储存,风吹日晒,劳动量够重的,但对我们来说有个好处,可以感受一点瞬息万变的“文革”形势,大卡车从西直门内大街、地安门北大街或是西单北大街、广安门大街等街道疾驰而过,两旁到处都有五颜六色、新奇古怪的大标语,李庄和我就边看边窃窃私语,小声议论。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月×日文件!”这类“文件”,我们这类人照例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但从标语上多少能猜到些大致内容,肯定又是大大地鼓动某些造反

派们采取新的革命行动了。

“××同志×月×日讲话，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这种讲话，自然也是听不到的，但也可以猜测到一二。后半句含意搞不清楚，“资产阶级”指的是谁？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不像。那个“××同志”对他们是没有兴趣的。也未必指我们这些顶着“走资派”帽子的人，我们本无什么“威风”，如果有，也早被灭得干干净净，何用等到今天！李庄微笑说，看来那大标语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正在千方百计地搏斗，要拼个你死我活。

有一天，车过厂桥附近大街，忽然看到一条新的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朱德！”这一条使我们两人万分震惊。沉思好久，那年月，“打倒”谁都不会叫人意外，但是污水竟然泼到全国军民敬仰的总司令头上，却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想来未必会怎么样，然而这年月，谁又能担保不会怎么样呢？彭老总不是也竟然被拉到报社来批斗吗？要是没有人授意、暗示、怂恿，谁有那么大胆量敢贴出这样的标语！我低声问李庄：“这是怎么回事？”他冷静地摇摇头：“不奇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军委扩大大会上，林彪不是就破口大骂朱老总是野心家吗？”我又问：“你说发生这样的事，他老人家究竟知道不知道？”他没有回答，盯住我望了几秒钟，叹口气：“谁知道！”出于为老帅的安全担心，我们都陷入沉默和悲凉中，直到卡车驶到西直门货运站月台边，再也没有开口。

又有一天在车上，李庄指着满墙大字报，忽发奇问：“我纳闷，他们哪来那么多白报纸？”

“文具店买的呗。”我随口回答。

“你老兄真是！”他笑笑：“文具店能买到这么多大张白报纸，经得住天天刷、到处刷？又不是咱报社。”

我们边看大街两旁接连不断的大字报、大标语，边议论，这种大张白报纸，都是由造纸厂按国家调拨计划直接发到报馆、出版社、印刷厂的，文具店根本买不到那么多。这些由吉林、牡丹江、广州、南平造纸厂工人们日夜奋战生产出来，又由铁路工人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又由搬运工人顶风冒雪运回来的雪白的大张报纸刷到墙上，寿命大约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被后来者遮盖，或者风吹雨打，零落成尘。说到最后，李庄长叹一声：“纯属纸张浪费，大约也是革命的需要。要不，怎么体现大好形势呢？”

这样的私语只能在大卡车上，悄悄地进行。从西直门拉大纸回报社，一般情况是上午两趟下午一趟，七八辆卡车搬运，我们在货站月台上依次往卡车上推大纸，

每个卷筒纸大约五六百公斤，推了四个，搭上跳板，再往上面推三个，每辆卡车装七个卷筒纸，就拉回报社，另有一拨人在报社后院里负责从卡车上卸纸，推进轮印车间。我们在西直门装完最后一辆，大约休息半小时左右，就能远远看到第一辆空车又驶进货站，于是再装第二轮。然后，三三两两分别跳上车回报社吃午饭。饭后再去装一趟。如果到货集中，隔十天半月就运到广安门外马连道纸库存放。回来路上，李庄和我总是跳上同一辆车，席地坐在卷筒纸边，就是两人随意聊天的时候了。我从1952年底由上海调来北京，分配在文艺部，李庄作为总编室主任，长期值夜班，有几年还被派去莫斯科当苏联出的《苏中友好》杂志顾问。十多年里，我们除了编前会之外，单独接触并不多，更不用说从容聊天了。搬运组一年推大纸，让我们有倾心交谈的机会，很是难得。我们又都喜爱古典诗词，触景生情，自然而然会背点诗词名句，借题发挥。有一回突然下起霏霏细雨，我们就即兴想起有关风雨的诗词，李庄先背诵两句《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接着念“满城风雨近重阳”，他又念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我就念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路上轮流吟诵，顾不上衣衫淋湿，直到卡车驶进报社后门，跳下车回到搬运组那间大屋，意犹未尽，似乎满腔郁闷、惶惑和愤懑也能稍稍得到些慰藉。

搬运组大多是中年老师傅，收入菲薄，生活艰苦，但是和睦相处，互相关心，对我们两个顶着“走资派”帽子来劳动的人也不另眼看待，仍以“老李”、“老田”相称，毫无隔阂。如遇下大雨，报社当天印报的大纸还够用，就不去西直门，集中读报；师傅们有弄不清的名词，都向老李请教，他都详尽地解答。几个河北来的青年临时工爱请老李讲战争故事，他更乐于有求必应，回忆自己的经历，讲太行山的反“扫荡”必定讲到朱老总，讲朝鲜战争反击美国侵略军也必定讲到彭老总。有一次他因病卧床几天，我陪老苏老冯下班后去煤渣胡同宿舍探望，劝他安心休养，不要着急，李庄热情地招待他们喝茶抽烟。在这样和谐宽松的小环境里，我们两人享受了相对的心情舒畅，满城风雨中飘动着几缕温馨。每天拉完大纸，冲了澡，便随意在街头买几份红卫兵小报回家，不管大楼里贴满打派仗的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二年夏天先后离开，李庄被调到别处，我被关进“牛棚”。

国庆前三天，搬运组有一件大事：为张兆存办喜事。老苏前两天就通知大家，那天拉两趟大纸到马连道。吃完各自带来的午饭，就借纸库一间空屋，摆了点糖块，用

红纸剪了双喜贴在墙上，就算礼堂了。李庄和我自然也应邀参加婚礼。事先我们商量，是不是要送一份贺礼表示一点心意，但是目前“非常时期”，而我们两人是“群众监督劳动”来搬运组的，不能忘掉身份。老李说：“还是不送为好，人到了，当面表示祝贺，就尽心了，兆存不会计较的。”婚礼原定两点钟开始，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未举行，正在着急，看到一辆小轿车开进纸库大门，车门开处，下来的竟是“文革”跟陈伯达到报社夺权当了代总编辑的唐君，由两个“造反派”陪着。李庄和我都有点意外，不知是哪一位施展什么神通，竟能将当时报社的第一把手搬来。唐君一到，简单的婚礼立即开始。师傅们有的围坐在屋内长桌边，有的站在门外看。我和李庄在这种场合当然自觉靠边，站在门外，不能同革命群众平起平坐。唐君大约算是主婚人吧，讲了几句祝贺的话，给两位新人各佩一枚像章作为贺礼。然后，兆存的一位表哥作为家长致答词。这位表哥原先也是报社职工，前几年调出去支援兄弟单位，刚才他到场时同李庄和我都亲热地打招呼，可能并不清楚我们两个现在是被勒令到搬运组劳动来的。他开口就说：“今天兆存结婚，承蒙报社领导唐××同志、李庄同志、田××同志亲临参加，我代表家属非常感谢……”

我一听心中不禁一怔，怎么能将李庄和我同唐××并称为“报社领导”！李庄也在皱眉头。再偷望一望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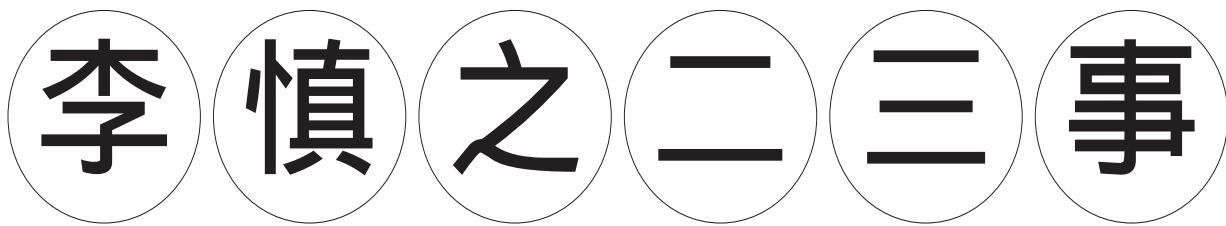


文革后期，李庄在大庆采访时留影

那个代总编辑果然板起脸，一副不悦之色。表哥的答词刚完，他就起身说还有工作要先回报社，转身出屋，跨上汽车，一溜烟走了。大家继续说笑打闹一番才散。事后听说，唐君非常生气，在一次什么会上批评：“有些革命同志警惕性不高，竟然让我同走资派一起参加一个婚礼。”李庄和我私下议论，幸亏发生在报社里不被注意的搬运组，又是在马连道纸库，若是在王府井大楼里，肯定又会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再有好事者写份小报告送上去，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手里，说不定又会玩出什么花样。

前些天，在报社大院遇到已退休的兆存，提到他在马连道纸库的婚礼，都感到日子真快，一眨眼竟快三十年了。他已经退休，儿子也已在报社工厂上班了。我们说到春天去世的李庄，又说到搬运组这些年先后去世的老梁、老程、老刘、老苏，回首在王府井报社后院和西直门货运站的日子，都不禁感慨好久。今年夏天北京多阵雨，此刻又是连天阴霾、满城风雨的时分，雷声隐隐，急雨敲窗，那年从西直门回报社在大卡车上背诗的情景，依稀又到跟前。想起前人“最难风雨故人来”诗句，凝神窗外，不知李庄的英灵风雨中正在何方安息？

（责任编辑 萧徐）



● 陈乐民

老李(慎之)走了三年多了,在他西行启程时,我曾以《山高水远望斯人》一文送别(刊于零三年的《随笔》第四期)。然而,他似乎没有渐行渐远,在我脑子里的记忆中,时不时地跳出来一些交往中的情形,遂择其一二,顺手写下,聊补前文之意犹未尽。

我与老李第一次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现欧洲研究所),老李先于我一些时候从新华社到中国社科院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八十年代初,社科院新成立了几个国际问题的研究所,美国所和西欧所即属于这样的新所,都正值草创时期。一天上午,老李到西欧所来与主持西欧所工作的施谷同志谈一些研究所的实际问题;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相识,到革命根据地之前分别在清华和燕京读过书,在那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中午,施谷叫上我和老李一起在西欧所的食堂吃午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李。创办新所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够,需要赶快“调人”。我是施谷“挖”过来的,老李说他正在办把资中筠“挖”过来的事。当时十年浩劫刚过,“改革开放”

提出不久,大家都有一种要把失去的时间追赶回来的急切心情。后来从施谷和别人那里得知老李的坎坷经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长期当了“右派”,到“改正”时已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

从此我们在社科院内成了“同事”,他随后当了副院长,我做了西欧所所长,接触的机会便多了。

接触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按照通行的“官衔”,副院长是“副部级”,但同他交往,怎么也看不出有个“副部”的样子,他自己也说根本不会当“领导”。有时故意打点儿“官腔”,但总也不像;因而不免被有经验的“下级”所问倒。我找他去“请示”工作,到他办公室便“破门而入”,用不着先通过秘书约时间;他也没有专职秘书,许多事都自己动手。

初识他的文采,是由于他送给我一份油印的材料(彼时尚无电脑),封皮上标题:《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下半页是他写的几句“编者前言”:

“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

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这样的文言文在我们“国际片”里是很少人能写得出的。《举隅》就是把《管锥编》和《谈艺录》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语句摘录成册。我问他是否打算发表,他说不,只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然后他示意如添齐法、德、意,乃至拉丁文,那就丰满了。我确有意把法文补上,西欧所有懂得、意文的,但绝无这种兴趣。我因事忙,法文终于没有补上。存此一帙,竟成永久纪念矣。

老李作为副院长分工主管“国际片”各所,(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西欧、苏联东欧、日本、亚非、东南亚、拉美等八个研究所。)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当时时局延请一些对相关问题较有了解的人来给各所所长讲讲,然后大家讨论,起一个互通信息,把世界各地重点问题串通起来的作用,减少了各所各司其事、不谙全局的偏颇。

他很看重“国际片”的文风问题,常说把文章写得“清通”,是作研究工作的起码要求。他常举老先生的文风为例,

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费孝通先生;在哲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冯友兰先生。说他们的文字深入浅出,没有“疙瘩”,非常顺畅。

他提倡学术自由,从不干预各所的具体问题,给各所以完全的自主权,更不做耳提面命和命题作文那样的事。而是经常地思考一些带有世界全局性的大问题,传达给大家。八十年代初我随他访问美国,其间他突然对我说,他感到世界性的人口素质差异问题终将在某一天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当时我对此问题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想想这确是个全球性带有趋向性的问题。试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冷战后”的变化,以及亨廷顿讲“文明冲突”的文和书,等等,再回想到他早时说过的话,会感到他所思之广,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尔后亨廷顿提出的问题。他在九十年代初提出“全球化”问题,在中国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罕见的。可见是他思考和观察很长时日的结果,绝不是出自一时兴起。

一次他问我,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应是怎样的人。我顺口答道:首先应是“通才”。他很赞成,说:国际问题似易实难。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拓宽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一文,大意就是国际问题的研究需要与文史诸学相结合,即要有文史底蕴,不能满足于材料堆砌,讲“国际故事”。他看到后表示赞同,并说,我的文章只讲了学科的结合,应该还讲出学科的区别;文史是文化学养问题,“国

际”是眼界问题,加在一起才成为“通才”。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朋友间相聚,只要有他在场,就是他“包场”了。不过他非常讲长幼有序的“礼数”,座中如有比他年长的,他是绝不会“造次”的。如果是平辈间争论,则非争到底不可。

他同我闲谈的时候很多,东拉西扯,大部分都忘了;而且是他说的多,我听的多。但要求我为他做的具体的事只有一件:他知道我喜欢康德,要我给他摘录一些康德关于“自由”的观点,说实话,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康德的东西是无法摘成语录的。但我揣测他可能正在思考“自由”这个理念在文化史上的来源。我认真地摘了好几段我认为最能反映康德有关“自由”的观点的话。他说,“自由本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东西,康德却说了那么多!”

晚年他很重听,我也聋了,每次打电话都很长,聋子对话,声音特别响,内容总是他正在想什么和看到了我写什么。他对我写的东西的最大的批评,就是太短、太含蓄,他说:你为什么那样“惜墨如金”?一篇说理的文章,没有三五千字是说不透的,可是你总是话留半句,你的观点我都赞成,但也只有我才能看出你的下半句来。我说我的文风变不了了,写不了很雄辩的长文章,怕是性格使然吧。一次在电话里我跟他说某名声很大的美籍华人学者在北京某会上含糊其词地说似乎

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起了启发作用,我很不赞成。他大声说:你就该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以“思想家”的姿态批评他这个观点!我说我已在不止一篇短文中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他说“太短”,再次说也就只有他才能看出我的意思。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启蒙者”的文章,举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如何受到英国影响的例子。他说已看到了,你可能是很少数的人明确地这样写的。但是我希望你针对那位美籍华人学者的话再写一篇,要点名点姓。然而我太懒,终于没有写。中国的孔儒之学对欧洲启蒙时代产生了如何如何大的影响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和国外一些人当中相当流行,至今不衰。中国人热衷此说大半是因为因此给老祖宗的脸上贴了金,自己也觉得“光彩”。老李很注意这个问题。他有一次对我说,听域外某公说,最近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孔儒之学在未来的世纪中将引领世界潮流(大意),而且上了报纸,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即使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又怎么样?他说,那也要弄清楚是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很快他从某公那里拿到据说刊登此语的几份法国《世界报》,让我看看。我仔细看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有关“confusius”的一句话。总之,我觉得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老李是我的“知音”。

确实是,我写的东西,他都看,不时在电话里发表评说。他看到了我写的一篇《陈序经与

中西文化》，打电话来说：“陈序经可是‘全盘西化’啊！”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所谓“西化”被“热批”的时候。他说，你的文章我都剪下来放在一个口袋里了。我有一篇不关痛痒的随笔，里面用错了一个典。很快就有人指出并客气地说，也许作者“腹笥宏丰，别有所本”。某日，老李到医院来看我，笑眯眯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块剪报（即批评我的那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说：我看到了，是我错了。他调侃说，那你不是“腹笥宏丰”？我说，所以没有“别有所本”。相与大笑。老李卧室里有张木床，整齐地摆满了一叠一叠的牛皮纸信封，从报刊上剪下的文章或资料，分门别类地分装在这些纸袋里，袋上注明是某人某人的文章。他剪收的文章不拘作者是否知名，年龄大小，身居何处，只要有参考

价值，无论是他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都不拘一格，成为他“思想体操”的资源。所以，他每提出一个振奋发聩的观点，都能贴近和反映大众的心声。他的文章独具风格，却绝不是放言空论。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他的暮年压卷之作。细读这篇满怀“与时俱进”精神的文章，凡有良知、不存偏见的人都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所感动。他退休后的十多年是他生命中最闪光的时期，所思所想莫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他常说，他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一番“动心忍性”写出来的。访问德国期间曾得了小中风，以后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地每况愈下了。但他的思想依然年轻而活跃，在住进医院前在电话中听到他宏亮而有些口吃的声音：我只想

做一件事，就是为民主呐喊，为民族的启蒙呐喊。接着他冷不丁地问我：你对丘吉尔怎样看法？我一时回答不出，他把电话挂了。我至今弄不清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又“飞”到哪里去了。他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他最后跟我说的话。

不久前，一个偏远地区的青年教师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很敬佩老李，如有机会到北京，他定要向老李的遗像三鞠躬。

盛唐诗人高适有“别董大”二首，谨录其一，以结此文：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零六年四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责任编辑 萧徐）

一份历史文献的保存经过

● 王 鹏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有一份保存完好的《大公报》。这份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的报纸，已有104年的历史，其报龄之长，堪称世界中文报纸之最。

完整保存这样一份百年的报纸，在世界集报史中也称得上奇迹。特别是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重大社会变革。由于战乱不已，《大公报》不得不几经流徙，先后创办有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报纸也曾几易其主，先后参与办报的人员难以计数。加之印刷纸张粗糙，旧报纸保存确实困难。那么，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是如何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呢？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然而当这历史正在演进的时候，人们恐怕并不经意。世纪之初，外患严重，腐败的清廷日渐没落，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天主教徒英敛之先生（1867—1926年），恨国家不振，“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满怀文章报国之志，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报名“大公报”三字，由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题写，并一直沿用至今。创刊之际，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的字样，意为“公正无私”，这也是英氏创办《大公报》的初衷。然而，在办报初时，由于保存资料的意识不强，没有从办报之初就建立起存报的制度，这就给以后收集这套报纸带来了许多麻烦。

最初产生收集整理一套完整的报纸资料的想法，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这时距《大公报》创办已有43年。在这43年间，《大公报》几经周折。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意欲文章报国的英敛之心灰意冷，转而走向了慈善报国和教育救国，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以后还担任了第一任辅仁学社社长，因而把报

社资产盘售给了商人王郅隆（1863—1923年），1916年9月，《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结束了。王郅隆聘请了胡政之（1889—1949年）为总编辑，在这以后，《大公报》虽曾有过讨伐张勋复辟和派记者采访巴黎和会、披露重大事件内情的辉煌报道，但始终因经济困难，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最终难逃停刊厄运。1926年9月1日，吴鼎昌（1884—1950年）、胡政之、张季鸾（1888—1941年）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使《大公报》在天津得以重张。自此以后，这份报纸除因受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新闻检查而被迫短暂停刊外，即便是在战乱之中，也基本上做到了一天不辍地出报。

1936年末，胡政之、张季鸾深感日军的侵略迟早要扩大到华北，天津不是久留之地，决意创办上海版《大公报》，以继续坚持为抗战宣传。1936年4月1日，《大公报》成功地抢占了上海滩。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很快波及天津。1937年8月4日，天津版《大公报》发表了“暂行停刊启事”，报社人员分赴上海、汉口等地，加强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的编辑力量。日军的侵略逐渐近逼中国腹地，沪、汉两地的《大公报》又被迫停刊，报社人员不得不再一次内撤，并在英属香港发展，办起了《大公报》重庆版和香港版。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港馆人员撤往内地，创办了《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9月，日机轰炸桂林，桂林版《大公报》停刊，编辑人员撤到重庆。抗战期间，重庆是《大公报》的言论中心，也是它的最后归宿。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大公报》才结束了战乱流徙的命运。

抗战胜利了，老百姓企盼着安定的生活，《大公报》也面临发展的机遇。这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在重庆做出恢复上海版和天津版的规划，准备重整旗鼓，把《大公报》办成中国报业“托拉

斯”。1945年11月1日和12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先后复刊。这样,就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渝、沪、津三足鼎立的发展之势。1946年4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编辑王芸生随即到达上海,成立了《大公报》总管理处,调整了渝、沪、津三馆的力量,形成了以上海版为言论中心的发展格局,并筹划出版广州版,使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有一张《大公报》。广州版的计划因内战的原因,未能实现,不得已只能在1948年3月恢复香港版,以辐射内地华南地区。恢复香港版是胡政之的决策,现在看来是有远见、有眼光的,至今这份文化产业仍在发挥作用。就在《大公报》蓄势待发之际,一份挥之不去的烦恼始终困扰着胡政之和王芸生——在渝、沪、津三地报馆中,凑不全一套自创刊以来出版的完整的报纸。

事有凑巧,就在天津版恢复不久,有一天,一位姓李的先生来到天津《大公报》馆,找到津馆经理曹谷冰(1895—1975年),说他有一套自1902年6月17日至1937年8月4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一份不缺,但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强迫买去。这位李先生对曹经理一再表示,如果能找回这套旧报纸,他愿意送给《大公报》社。曹经理听完李先生的话,陷入了沉思。这位1927年参加《大公报》编辑工作的人,自然对这份报纸有着很深的感情。李先生所说的1902年至1937年三十五年间整套《大公报》,会不会已被日本人运送回国?如果它仍在中国境内,会在什么地方呢?他把寻找这套《大公报》的任务,交给了曹世瑛(1911年—)。

曹世瑛是1928年进入《大公报》的,从练习生做起,当时已成为报社得力的外勤记者。接到任务后,曹世瑛马上找到负责接收敌伪机关资产的国民党天津党政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的人整天忙着“五子登科”,抢占房产,攫取资财,没有人对一堆旧报纸感兴趣。曹世瑛几经周折,多方“打探”,才听说这些旧报纸可能存放在原日租界公园后面的“日本居留民团图书馆”内。当时,这个图书馆已作为敌伪资产被接收委员会封存,任何人不经特许不得入内。究竟这套报纸是否在图书馆内,曹世瑛不敢肯定。他立即把这一线索向曹谷冰经理汇报,为此,曹谷冰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请其关注并帮助找寻,但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据曹世瑛回忆,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原来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接管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将没收的英法侨民的图书,也存放在这个图书馆里。抗战胜利了,这些英法侨民通过中国

外交部,要求到这个图书馆寻找他们当年被没收的图书,这才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他借此机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跟着这些英法侨民也进入了图书馆,但他第一次进入图书馆并没有发现这些旧报纸。他并未就此罢休,转天又一次来到这个图书馆,找遍了书架和书库,《大公报》还是毫无踪影。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看见房犄角有一个躺着的板子,掀开一看却是一个地窖。他鼓足勇气,摸黑进去,模糊中看见地上有一大堆土埋封尘的东西。揭开覆盖物,三十五年的《大公报》赫然在焉。欣喜若狂的曹世瑛马上意识到,他到图书馆是以“采访”的名义进来的,这些旧报纸一张也带不出去。他马上爬出地窖,掸掉身上的尘土,不由分说来到国民党天津接收委员会,找到负责人之一的张廷谔,向他说明了情况。好在这些旧报纸在张廷谔眼中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于是,他很痛快地给曹世瑛写了一张条子,同意曹把这些旧报纸取走。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曹世瑛雇了十几辆三轮车,又约了报社的十位同事帮忙,浩浩荡荡,把三十五年间的整套《大公报》运回了报社。后来,报社资料室的杨克武等人,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对这套旧报纸悉心整理,装订成册,共计400多本。对于那位收藏家李先生,《大公报》社赠送黄金二两为酬。

天津版《大公报》是《大公报》历史中的重要阶段,也是最难保存的部分,以后的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保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1949年以后,各地陆续解放,在新中国报业调整中,天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庆版《大公报》改名为《重庆日报》,均脱离了《大公报》。因此,中国内地只剩下了上海《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报社迁至北京,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成为报道财经和国际问题的全国性的专业报纸。这时的《大公报》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8号,(现改为173号)已经有了8000多平方米的宽敞馆舍,《大公报》在各地的文献资料、档案等,包括过期旧报纸,都集中到了北京,各种资料、档案的保存,也有了条件。

早在筹备新中国建国之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就秘密接受毛主席的邀请,同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一道,从当时还是蒋管区的上海来到北平,以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57年末,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向政协委员提出的撰写

文史资料的号召,决定着手撰写“大公报史”。编写报史,首先要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报纸。这样,报社作出决定,由张蓬舟(1904—1991年)帮助王芸生、曹谷冰搜集整理旧报纸。

时任报社资料室主任的张蓬舟,原是1936年进入《大公报》做编辑、记者工作的。出于对资料工作的浓厚兴趣,解放初期,他主动申请到报社资料室工作。当他接受新的任务后,首先把报馆内保存的旧报纸又重新翻检了一遍,发现还有不少缺张或残页。他先后到了汉口、重庆、上海、桂林、香港等地,遍访官方和民间的档案、资料管理部门和熟悉的收藏家、老读者,硬是把缺张和残页都补齐了。这时,在北京《大公报》的资料室里,才真正有了一套完整的《大公报》。王芸生、曹谷冰正是据此才撰写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和《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等两篇长文,发表在由全国政协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大公报》更是不能幸免。由于《大公报》有着几十年的办报历史,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变而始终未停刊,是当时仅存的从旧中国延续而来的唯一一张全国性的大报,这就有了历史复杂的最大嫌疑,所以成了造反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文革”初期,《大公报》社即由北京“文革小组”接管,但在造反派的干扰和巨大压力下,正常出报已无法保证,报社党组不得不向上级党组织请示,经批准,北京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宣布停刊。保存完好的那套旧报纸被运到《北京日报》社,放置地下室。这时,已退休在家的张蓬舟再次挺身而出,他冒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保护好这套旧报纸。(毛主席曾在这封信上有批示,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不久,这套旧报纸被移送到已被重点保护,不允许红卫兵进入造反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予以保存。

应当说明的是,《大公报》在出版过程中,曾先后有津、沪、汉、渝、港、桂各版,最多时,在全国四地同时出版报纸。受运输条件所限,各版报纸只能在当地排版印刷。又由于受到当时电信发展水平和报社经济能力的局限,各版报纸只能做到重要消息、社评统一刊发,一般消息和副刊文章则由各版自行采编,因此,同是一天的报纸,各版内容并不完全一样。目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从出报日期上说,是一套一天不少的完整报纸资料,

但若分版按期排序,还是尚有少许缺漏的。

公正地说,在近百年的办报过程中,英敛之以及后来者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1901—1980年)等一批知识分子,虽然因种种局限,难以超越时代,但他们毕竟为反映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付出了努力。虽然报纸难以与当事人的第一手档案材料相提并论,但作为历史档案的辅佐,一份完整的《大公报》仍不失其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和我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的价值,我们的历史记载也因为有了这份记录而更为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宣传抗敌、誓不投降的精神,受到各方瞩目。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中国《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贡献,决定把该院一年一度的“荣誉奖章”(1941年度)授予中国《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的贺联写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和“同心协力”。在亚洲,曾获得过这一荣誉的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这也说明,中国《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享有的声誉。

现在,这套旧大公报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已把1902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拍摄成微缩胶卷,供查阅资料者使用,原报已被封存。人民出版社已将四十一年的天津版《大公报》影印出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正在整理之中,也将陆续影印出版。目前,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有了电子版,还可刻录成光盘,保存和阅读就更方便了。

这套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历经战乱和“文革”的洗礼,终于保存下来了,确实不容易!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从周正毅到张荣坤

● 周瑞金

三年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出事,在上海滩引起一场风波。今年5月26日,周正毅服刑期满,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门,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此后虽有一、二家上海媒体报道他仍想“东山再起”。但在香港廉政公署强调对周正毅发出的通缉令仍然有效后,便像被蒸发掉一样,在上海所有媒体上再也寻找不到有关周正毅的半点音讯。

是的,周正毅的事还没有完。今年一月,他的妻子毛玉萍就因串谋造市,诈骗上市公司股东的罪名,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半,而周正毅系该案的另一主犯,因此香港廉政公署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尽管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上海方面谈不上协助香港廉政公署引渡或移交周正毅问题。然而,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被通缉人士”栏上,赫然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周正毅。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只要周正毅进入香港,或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定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会采取拘捕行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金融界人士刘梦熊起草了咨询意见,呼吁香港60位立法会议员推动动议,不能让那些破坏香港金融和法律秩序的犯罪者在内地逍遥法外。

就在沪港两地人们正关注周正毅风波如何平息之时,想不到上海滩又冒出一个张荣坤来。8月11日,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被免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原因是“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这是近年来上海市涉案级别最高的官员,涉案金额高达32亿,而且是社保基金的“养命钱”。因此,案情一暴露,虽然媒体报

道低调又低调,仍引起全市上下震动!

案情发生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查封、冻结了涉案企业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昆山福禧现代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应财产,完成了对相关资产的诉前保全,有效查处了有关违纪资产,目的是力争依法全额追回违规操作的社保基金。与此同时,确认与福禧投资方面有关联的财产,包括在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权,也被全面冻结。

区区一个局长的“落马”,竟冻结如此众多公司的财产和股权,而这些财产和股权又都关联到一个人:张荣坤。在祝均一被“双规”的当天,张荣坤也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了。接着,又牵出上海电气集团的王成明董事长和韩国璋副总裁,相继“落马”,接受审查,导致“上海电气”、“上海机电”两家上市公司停牌。

掀起如此巨波大浪的张荣坤,何许人也?他1973年出生于苏州,开始从事粮食加工、家具制造,几乎与周正毅一样,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民营企业家。2000年他来上海成立一家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竟是一家蛋糕店,店里员工都不知何谓“沸点投资”。这就是张荣坤初进上海吊诡之招。2002年他成立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不久就以32.07亿元的价格向国有上海城投公司收购“上海路桥发展”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据上海资产评审中心确认的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经营权价值为35亿4千万元)。这一破

天荒削价收购,因开创“民间资本首先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纪录而轰动申城。接着2003年福禧再次斥资50亿元购得嘉金高速25年的经营权,这是一条通往上海F1赛车场的高速路。2004年它又以5.88亿元购得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截至2005年6月底,福禧投资公路里程越过200公里,投资额超过100亿。“公路大王”称号,由此被叫响。

上海“公路大王”又把触角伸向金融保险业,共投资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11.03%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10%股权,中再资产管理公司9.9%股权,中国保险报业公司15%股权。令人咋舌的是,2004年张荣坤出资10亿元购得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大家知道,上海电气是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业集团,在上海国有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于2005年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价约合每股1.7元人民币,以此计算张荣坤的股份升值至16.5亿元,短短一年他的账面净赚了6.5个亿。

张荣坤登陆上海滩仅五年多时间,不仅具有超强的融资能力,注册资本仅5亿元的福禧投资竟轻松自如地动用百亿资金收购最优资产和股权。而且,在垄断地带游刃有余,屡屡有惊人之举。如上海电气改制,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西门子、GE、通用这些战略投资者竟无缘入围,让根本与电气不搭界的张荣坤独占鳌头。这不是神奇的谜吗?还要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出事前几个月,福禧投资还发行了面值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开创了国内非上市民营企业公开融资的先河。人们有理由发问:无论是介入繁华高速公路、进入关键国企集团,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张荣坤总能捷足

先登,他究竟凭什么搭建了“近水楼台”,从而屡屡地实现“先得月”?

今天这“神奇之谜”终于揭开一层面纱。祝均一“收受贿赂”,让他得以动用上海巨额社保基金去收购高速公路;王成明和韩国璋趟混水,让他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近日国内一家媒体披露了张荣坤在上海滩发迹另有“神秘武器”,在于他热心慈善事业。早在2000年他进军上海之初,就参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一次就摔出200万元,一举夺得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桂冠。2002年他更上一层楼,一年慈善捐赠花掉2706万元,为此把福禧投资一年的利润赔进去不算,还倒亏了486万元。如此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不仅为他创造一系列融资、收购的奇迹,而且为他获得各种令人目眩的社会头衔,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监事长等等,都为一个年仅38岁的张荣坤所拥有。

上海三年间,冒出两个“问题富豪”。从周正毅到张荣坤,一个从“阿毛炖品”起家,一个靠粮食加工、家具制造发迹,短短几年内从无名小辈爬上巨富新贵。这固然是他们长袖善舞,但谁都知道少不了掌权者的撑腰。这真让人感慨:今日上海滩难道果真成为孵化“中国富豪”的“新冒险家乐园”?

(责任编辑 萧徐)

卫生部医药卫生优秀期刊

中老年保健杂志

全彩月刊 全年订价:62.4元 单价:5.2元/本

邮发代号 82-221

关爱父母是儿女的责任
父母健康是儿女的福分

订阅电话:
010-64284311
010-84205154
网 址:
www.bj626.com

订全年杂志 赠精美日历

列寧對社會主義市場關係認識的修正

● 江春澤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书《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书中第一章描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7年间,多次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更改原来的设想、计划或行动方案。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的思想不是僵化的,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既不是从传统的固定理念出发,也不是囿于前人的“本本”和“原理”,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实践的经验教训而不断变化、创新、发展。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有意义的。

(一)“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始于列宁。列宁毅然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并非依据马克思的“本本”所预言,而是根据当时俄国内外的实际形势,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但他以为通过俄国革命可以点燃欧洲革命的熊熊烈火,期待着所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到1918年8月,列宁放弃了这种想法,实事求是地承认:“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既无理论可依,也无经验可循。列宁直言不讳地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的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用盘子托着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他强调只能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来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还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设想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管理处”、“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但是,俄国当时现实的情况是,内有武装叛乱,外有武装干涉,工厂里管理制度瘫痪,劳动纪律瓦解,经济濒临崩溃,上述设想根本就行不通。列宁不得不放弃这种设想,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在工厂里通过实行“一长制”来加强管理,甚至认为“一长制”的领导者可以是“资产阶级专家”。他把夺取政权初期的“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口号改为“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他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他强调“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

机关，……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

后来，由于战争日益严酷，列宁被迫暂时中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把全国经济转入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轨道。

(二)“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

1920年底战争结束，战时体制要不要及时向和平建设体制转变？当时党内外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容许不容许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存在。有的人主张不容许，因为流转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则主张容许，并提出用粮食税取代战时“余粮收集制”，让农民在纳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反对者指责列宁的观点是“对农民实行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对小资产阶级投降”。

列宁的设想是：上面实行集中的大工业即社会主义大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把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因素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他认为在一些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俄国可以实行这种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当农民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的小小缺口被打开以后，国内市场就迅速活跃起来，而且往往自发地越出当时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击国家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许多人（包括列宁和俄共）都认为“商品交换失败了”，因为“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商品交换失败”是指有组织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失败。其实，国内市场的活跃正是新经济政策的成果，表明市场的活力是巨大的。在总结这一“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列宁因势利导，乘机把这一政策推向前进。他反思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的主要错误就是只作最好的打算，因而陷入官僚主义的空想”，必须“要作最坏的打算”。这个“最坏的打算”就是国家和政府退却，取消国家和农民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让农民走向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之路，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体现在市场



列宁在演讲（油画）

上，体现在商业上，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国营企业“必须采用商业原则”

继农村实行粮食税之后，列宁联想到城市改革问题，提出了4条重要的改革方针：(1)政府只集中经营最重要的企业，把不是最重要的企业租给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2)向工人提供的供给，不按职工人数分配，而按照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数量分配；(3)国营企业一律实行经济核算；(4)重新开设银行的贷款与储蓄业务。实行这些政策措施固然有受当时客观形势所迫的因素（1921年夏季，干旱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但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新探索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突破。

从1921年秋天起，列宁进一步思考两个与社

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重要原则问题：一是个人物质利益问题；二是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他又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除了必须重视个人尤其是农民的物质利益以外，列宁还认识到“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他说：“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四）“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对立起来，说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经过几年实践和理论探索，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公开宣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反省自己以前“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921年12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决议还强调：“不健全市场就不可能迅速恢复大工业”，“集中于工人国家手中的国有化工业必须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上的竞争方法，以争取决定性的统治权”。“经济核算制应该是经营所有国营工业的基础”。

列宁把上述新认识归纳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他说，这条新道路不仅必须经历“一

系列过渡阶段”，而且“不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列宁这个精辟的新观点，我们现在看来，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时由于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在强调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又提出要在资源分配上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原则，说“必须把最大部分的物资（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在国营大工业手中，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的生产工作不致中断。”1922年初，有人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两种原则是矛盾的。但文章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实行国家调节，而是主张坚持指令性计划，把国营工业排除在市场关系的范围之外，以免国营工业在竞争中被挤垮。列宁承认二者有矛盾，但解决矛盾的办法应该是国营企业提高效益，这就必须让它们进一步实行商业原则，到市场上去参与竞争。他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将来必定会是一种主要的形式。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原则。可见列宁那时对发展商业、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决议按列宁意见修改后付诸实施，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实行了商业原则，国家对企业用商品货币杠杆代替行政化的管理原则。

（五）“必须依靠个体农民”

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是从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转变到粮食税开始，继而推向城市，改革企业的管理体制，然后再回过头来，深化农村改革，重点是恢复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合作社。在1920年底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集体农庄“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

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根据列宁这一观点，1921年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宣布实行粮食税的同时，撤销了上一次代表大会以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从而为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恢复和发展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扫清了道路。1922年3月俄共（布）中央致信各级组织强调：小农经济有适应商品市场条件下的特别方法，不仅能够在市场条件下比较长久地生存下去，而且还能通过合作社改善自己的工作并提高工作的效益，因此，合作社在农业政策的发展方案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同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强调：“在实行实物税制和规定商品流转自由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形式是最好的、值得全力支持的形式”，“是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社网”。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晚期的著作《论合作社》中，提出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不是简单的指合作生产，而是在认识到市场和商业在过渡时期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过去列宁认为，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为此需要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集体化。现在认识到，不要去直接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建立产品交换和帮助小农集体化也不是当前的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实现合作化。列宁说：“因为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六）列宁的未竟事业和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在1921年提出的上述新经济政策是在一系列应急对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并非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想法，但

他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试验）——总结经验教训——修正原先的认识和行动方案——再实践——再总结提高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深化认识、升华为理论并形成行动纲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超过了前人，开始领悟到商业和市场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觉察到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阶段。如果当时能够坚持按照列宁的思路走下去，若干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在苏联建立起来，苏联的命运和前途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从列宁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列宁后来又患了重病，以致直到列宁逝世时，新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的理论尚未完备。列宁在晚年虽然宣布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但那时他的“根本改变”仅仅是在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而没有从根本上革新原来关于社会主义的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理念，没有放弃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目标，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套明确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体制模式。在当时的观念中，计划和市场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结合，但最终还是要用计划代替市场。所以，列宁逝世后，对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即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党内高层存在不同的理解，作各取所需的解释。不少人并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只把它看作是克服当时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例如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当时曾抱怨在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因此，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党内就发生了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而且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不是在一种平等的、互补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讨论，而是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即使意见合理也被扼杀、遭到打击和迫害。新经济政策就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被最终废弃了，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进程走了半个多世纪排斥市场经济的弯路，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沉痛的教训。

（责任编辑 萧徐）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 高放

一、从 1979 年起我接连不断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1946 年我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后 ,考进北京大学 ,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活动。1948 年 1 月越过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 ,奔向解放区。本想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 ,没有料到 ,我竟被送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 ,8 月间北方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 ,我又被吸收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 ,在著名学者何干之教授指导下攻读马列主义基本原著。1949 年 3 月我随华北大学的队伍从河北正定县迁进刚解放的北平城 ,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生活 ,担任学习助理员 ,开始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也在这一年年底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 年 3 月 ,中央人民政府以华北大学为基础 ,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文科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就一直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 ,从教员、讲师、副教授到教授 ,主要是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我也深受 “ 左 ” 的路线、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制的毒害。1978 年底我们党端正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之后 ,痛定思痛 ,我深感我们党在二十多年之中长期犯 “ 左 ” 的错误难以纠正 ,根子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严重弊病。

1979 年 ,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纪念 “五四 ” 运动 60 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 ,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史的优良传统》。文中指出 :“ 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是和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专制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反之 ,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又是个人迷信的政治基础。 ”“ 社会主义民主是根除个人迷信的消毒剂。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 ,就会导致个人集权过多。 ”“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巩固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 ,防止把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 ” 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写的这一篇论文 ,发表于《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1979 年第 4 期 ,全文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 年第 10 期。全文主题虽然是论述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但是已经点明要 “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 ,反对 “ 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 ” ,要 “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恢复和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 。即是说 ,我在 1979 年 5 月开始提出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到 1980 年 ,我进而探究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 ,并且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这一年 10 月 6 日我应《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 ,在首都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题为《重新总结历史经验 ,大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讲话 ,摘登于该报 10 月 17 日 ,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 12 期。同年 10 月 7 日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 30 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文中指出 : 民主共和制政体理应是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袖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背离民主共和制，必须进行改革，其核心是要妥善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实行党政分开；同时，我还对如何改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十点建议。该文后来分为《民主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刍议》两篇分别公开发表，现均已收入本书。在整个80年代，我曾经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尤其是就如何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等问题，发表过30多篇文稿，多次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接连不断呼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11月23日，我应邀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参加中央领导人布置的如何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我党党章从1922年起历来把党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机关，这样写法是不合适的；与此相联系，“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应该改为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党的地方组织和部门组织服从中央（如军队、工会、妇联、青年团中的党组织）。1986年11月26日，我又应邀到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参加了中央另一位领导人布置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座谈会。我再次提出以上以及其他有关建议。先后都得到党中央两位领导人的肯定，他们都说以后修改党章要考虑我的意见，采纳我的建议。

1986—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的日程，并且要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等七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为了配合党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1988年7月成立了半官方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由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任会长，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任名誉会长。杜润生、钱其琛、尉健行等23个部长级高级干部担任顾问。领导上曾派人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副会长。我当即表示，副会长理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可是中央领导人认为我发

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既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所以还是挑选我作为学者的代表就任副会长。7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大会，薄一波同志亲自到会，并且作了重要讲话。周杰会长在会上提出研究会有三项任务：介绍国内外各种有关资料，向中央和地方领导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理论研究与宣传。研究会成立后几次理事会都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由周杰会长主持会议。我们组织出版了一套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政治体制研究丛书》，1989年初创办了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还举办过讲习班，开展了与外国的交流。本来已决定1989年秋后由我担任团长，组成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考察访问。可是这一年发生了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也进入了步履维艰的阶段。

二、1989年以来我持续不懈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作为一名勇于独立思考、勤于深入钻研的老教授、老学者，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取得全面成功的头等重要大事。所以近十多年来我依然不减1979年以来愈益增长的锐气，不畏“左”的势力屡次对我进行种种打击，在讲坛上文坛上反复不停总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深层根源，持续不懈呼唤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9—1992年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的剧变使我深刻反思。不少人认为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党的领导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转去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的政治体制而造成的。我以为这只是表层的观察。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几乎普遍照搬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长期推行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僚特权制等等，缺少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拒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引起越来越多党内外人民群众的不满，结果这种政治体制终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些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大多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

力威逼之下,被迫转去推行体制外的改革,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竞争制,结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实践证明,长期的“左”势必助长后期的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也有个别党一“左”到底,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制、个人集权制和严密的思想控制等等,拒不听取群众正确意见,结果失败得更加悲惨。如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兼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尼·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12月底当人民群众上街奋起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他竟下令爱国卫队(即武警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引起部队哗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刻处决。罗共覆灭之后,罗马尼亚最终也转向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自觉地进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不论先“左”后右或者一“左”到底,结果都必然是转向进行体制外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来势迅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铁律。专制已无藏身余地,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应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容掺杂封建专制主义余毒,而要彻底清除苏联模式极权政治的这些毒素,饱吸中外古今各种政治文明精华,进而开创更高形态的民主。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消除专制、开创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人民大众最终只好被迫无奈去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固守专制、极权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终究是会被资本主义民主的巨浪冲垮的。

邓小平理论在国内问题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有两条: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深知: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而且“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病是“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于1986年强调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我认为邓小平这些至理名言至关重要,一定要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不论遇到任何风浪险阻,迟早我们都要尽力付诸实践。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决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显著加快。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以致党政官员的腐败超过8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轮又一轮的加剧现象。当前腐败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已呈现普遍化、团伙化、大额化、高层化、制度化的趋势。党政机关中机构臃肿、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官员特权等恶习依旧严重。要根治腐败等积弊,不能只靠治标,还必须治本,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在总结我国1949年以来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1989年至2005年又持续不懈就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40多篇文稿,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三、编纂本书的缘由、原则和目的

1999年底,我自编了一本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集,约70多万字,联系好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审稿后感到当时国内社会环境欠好,“左”的势力又抬头,还顾及大部头的厚书市场不便营销,所以要求我删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只保留有关政治学方面的19万字,先出一个精选本。由出版社取名《高放政治学论萃》,于2001年9月出版,印数3000册,迅即脱销。

到2002年,形势大有好转。我新编了三大本文集,当即由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书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只印了1500册。面市后很快就售完,很多读

者通过多种渠道向我反映要这本书。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从中精选 28 篇，另加上 14 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近三年新写的），合计 42 篇，重新编纂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我之所以要编纂出版本书，是想把我近 25 年来陆续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稿精选汇总于一册，便于读者倾听一个老教授、老学者声嘶力竭、长久呼唤、高声呐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希望借此能够唤起众多领导干部、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人民大众，增进共识，共同奋起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时常想起宋朝诗人王令（1032—1059）在七绝《送春》中留下的千古绝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古代传说子规，即杜鹃鸟啼叫最苦时会啼血。清末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赠梁任父同年》中还有肺腑之言：“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但愿我呕心沥血、忧思含泪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会得到东风的回响。

（责任编辑 萧徐）

代购代邮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代购代邮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3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19.00	5.00	
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	19.00	5.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李宗仁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们 祝东力	17.0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 提起朱厚泽，人们会想到他深邃而富于前瞻的思想，缜密而颇具雄辩的理论，他的思想理论一如他的摄影作品，有独特的视角，充满着历史的动感，洋溢着人情味、人性化和对人权尊崇的内涵，他的摄影作品渗透着他敏锐而透彻的感知、广博而自由的思想。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作者以海外留学生常见的两种行为——刷盘子和读书来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前者是以出卖简单劳动，以 GDP 速度为目标的模式，后者是以出卖知识和技术，以技术力提高为目标的模式，在本书中，作者严肃地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坚信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西方工业化的进程，研究了落后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追赶路径，通过中日两国工业化发展的比较，使读者看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经体制的紧密联系，并总结出简单而深刻的强国之道：民族责任、长远眼光、科学精神。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尹家民	69.80	8.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羡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	李海文整理	25.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风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庆	28.00	6.00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	朱厚泽	150.00	8.00	本书将会引起关注中国经济和民族命运的人们的思考……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董健	18.8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红色家书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35.80	7.00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附庸伦理与文人助纣为虐

● 张绪山

附庸即封臣,亦称奴才,是与“主子”相对的概念。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上,皇帝(或国王)之下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构成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等级体系。理论上,较低等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附庸,所有等级都是皇帝(或国王)的附庸。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和欧洲的附庸制度有所不同。

在欧洲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由于王权长期处于积弱状态,诸侯各自为政,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附庸对封主的强大依附关系主要限于直接的封主,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确立了他的从属关系以后,往往只是服从他的直接的主人(这个直接的主人往往即为绝对封主),并非服从主人的主人即间接主人,即使这位间接主人是国王或皇帝本人。这就是欧洲附庸制中特有的原则:“我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土地和国家政权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所有等级的附庸都服从于皇帝,各等级的封臣可以不服从自己直接的封主,但不能拒绝服从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这一原则只适合于皇帝以下的封主,对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对于各级附庸而言,“主(皇帝)忧臣辱,主辱臣死”,乃是通行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等级的附庸。这是东西方附庸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

在封建关系中,直接的主仆关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血缘家族关系之外最强大的关系纽带。因此,主人与其他发生矛盾或冲突时,附庸是断不能置身度外的,他必须加入到主人的行动。由于附庸本身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行事,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由附庸来承担;附庸按主子的意志犯罪,并不需要承担罪责。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不但附庸可以用自己的附庸地位为自己的犯罪开脱,而且整个社会也往往不加追究,这就是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伦理”。这种伦理培育了一种不管自己行为是非,一唯主子之命是从,也不承担个人行为后果的特有心理,即是“附庸心态”。

表现“附庸伦理”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三国时期,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之前,命记室陈琳草拟檄文声讨曹操,陈琳以其斐然文采,大挖曹操祖根,称其祖父与其他宦官“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其父“乞匱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曹操本人则是“贊阐遗丑,本无懿德;狡猾锋协,好乱乐祸”,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个狗血喷头,语锋犀利,用词刻薄,甚至令曹操这样处变不惊的乱世之雄听人读来都毛骨悚然,身冒冷汗。曹操击灭袁绍,俘获陈琳后,问:“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获得曹操赦免。史书以曹操“爱其才而不咎”来解释曹操不杀陈琳之事,其实并非尽然。因为,在曹操看来,陈琳昔日曾在袁绍麾下为其附庸,自己是与袁绍对立的敌人,陈琳骂自己是尽其附庸的职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可以“罪状孤”。曹操所不满的只是陈琳没有“恶恶止其身”,连他父、祖辈也痛骂了,这在曹操看来是太过分了。不过,就当时整个社会的附庸伦理

而言,陈琳所为是情理中事,即使曹操也是不能不接受的。所以,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根据为自己进行辩护,很容易得到曹操的宽宥。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使中国的士大夫很容易承认皇权的绝对对“封主”地位。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立的多元政治中,士子们可以凭自己的才识游刃于君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被定为一尊,“修齐治平”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实际上已经使传统士子下意识地在精神上确立了对皇权的主仆关系。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最终确立,更使这种关系制度化,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士子因科举之制而被笼络殆尽,自动投入附庸关系网时,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这话的真实含义就是:“天下独立不拘之人皆为吾奴才矣!”宋代以后,皇权极力提倡“君臣”纲常礼教,实际上将士大夫置于了绝对附庸的地位;所谓“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只是对某一级别的附庸,而是对所有附庸而言。

中国大一统传统下,绝对效忠只能及于作为绝对封主的皇帝;对绝对封主的效忠与其他封主的效忠发生矛盾,或绝对封主反对其他封主时,所有附庸都必须站在绝对封主一边,除非皇帝为非作歹以致天怒人怨,发生全国性的人民起义,暂时打乱附庸效忠关系。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按照皇命向任何人开战,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名正言顺”、“理固当然”。以历史著名的秦桧杀害岳飞案,秦桧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就附庸伦理和“附庸心态”而言,秦桧所为只是在执行绝对封主赵构的旨意,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错。岳飞一心要求收复河山、迎还徽钦二帝,是赵构极不欢迎的。如果事情真如岳飞所愿,赵构这位捡便宜登上龙位的皇帝将何以处之?因此,岳飞的雄心和执着只能导致被杀的下场。历史上并非无人看破此中机关。文征明(1470-1559)《满江红》诗作有云: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还,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已经清楚地看到,秦桧不过是尽附庸

(臣子)之道,杀岳飞的真正元凶是赵构。然而,几百年来,人们还是大话秦桧,对赵构则少纠其咎。此中原因固无他,乃“附庸伦理”使然。秦桧遭万世唾骂,后人铸造秦桧夫妻跪拜岳飞的铜像,文人墨客则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来评论岳飞与秦桧,以此表达对前者的憎恨和对后者的推崇,而真正的元凶赵构却没有遭到后人的笔伐。这个事实说明,在岳飞被杀后近千年的历史中,除了文征明这样见识卓绝的少数文人外,专制政权塑造的“附庸伦理”已是根深蒂固,即使在最有思维能力的文人社会中,也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附庸思维定式。在这种思维定式中,皇帝作为绝对封主的权威是至上的,是所有封建等级和等级之外的普通百姓的主宰,作为这个至上封主的附庸,是不能随意诟病的,可以诟病的是其他封主如秦桧之辈。

从历史上看,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所保留的士子人格理想,并未完全扼杀中国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孔子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际上主张士子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可以固守其起码的独立人格。孟子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作为士子操守大丈夫人格的基本标准,比之孔子,境界似更高一筹。这些思想对以儒家经典进仕的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加之,君王多冥顽不灵,也使士子不可能不对君主的依附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样的附庸“独立人格”是被动的,在“仕途经济”中衣食住行一决于最高君主皇帝(所谓“食君俸禄”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人格,实在是难乎其难,除非有陶潜(渊明)、郑燮(板桥)那样的恬淡心志、超凡智慧,是难以挣脱利诱之下的附庸罗网的。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何以许多文人犯下助纣为虐的勾当。

“附庸伦理”在近现代社会并未绝迹。“大革文化命”更将这种封建社会的心态推向极致。“最高指示”、“无限忠于”、“一切服从”之类强行灌输的咒语式的信条,重新确立了一个皇帝般的绝对封主。在这个绝对封主面前,人人都不得不纷纷表示“忠心”;在绝对封主要求人们讲究“阶级斗争”时,人人必然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其他任何阶级的人,甚至把人置于死地。“文革”刚刚过去以后,绝对封主当时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说过

的每句话都被奉为至上至尊——两个“凡是”即为明证。而这个“文革”时期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却被简单地推到了四个附庸身上。其实正如文征明诗所说，“笑区区，一桧有何能？”如果得不到绝对封主的赞同和支持，那四个奴才又怎能兴风作浪，将整个民族折腾得元气殆尽？

“附庸伦理”延续存留的另一表现是，“文革”结束以后，即使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甚至手上沾满他人鲜血施难者，也极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动忏悔自己的行为。江青受审时说过一句话：“我是他的一条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这个形象的比喻真可谓附庸伦理心态的绝妙的刻画。同样，“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施难者，正是以同样的“附庸伦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辩护。这种心态最明显一个例证，是一位早年留学西方的学者的所作所为。这位学者在文革中以自己旧时习得的古文竟然派上用场而沾沾自喜，与世俯仰，风光一时。文革过后，他竟然还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最高封主服务为自己辩护，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忏悔意识，

更不用说以自己的教训勇敢地劝勉国人引以为戒了。这种自我辩护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附庸伦理”已经浸入中国文人的骨髓。这

位学者算得上是接受了欧美近代文化的洗礼，可是他偏偏忘记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重视的人格独立，忘记了学者的

使命。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有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论学者的使命》）他不明白，学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尤其是具有独立判断力的思想者，是不能以他人的强力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辩护的。他应该明白，尽管他躲在书斋里，没有直接赤膊上阵，参加对其他同类的肉体拷打，但正是他的一篇篇“力作”为施难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相形之下，另一位同样留学欧美的学者，却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整个现代学人群体保存了起码的一点人格尊严，否则，我们的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真要发出“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了。正是从这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思想境界上，我们可以明白这位师长何以送给他那位曾给予厚望的学生“曲学阿世，侮食自矜”的八字考语了。

（责任编辑 萧徐）

《随笔》2006年第5期目录

孙 郁\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唐小兵\哲学家的两副面孔
——李泽厚、汤一介印象

邵燕祥\黄裳的“散文王国”
——我读黄裳散文的一些印象
燕 妮\《流动的房间》中“不变”的天堂
段怀清\穆旦的第二次启航

祝 勇\颤栗与尖叫
苍 耳\哑剧时代

张 鸣\又想起了王大点
魏得胜\桃花再开一扇门
陈启文\一条抛锚的古船
——拜谒石船山

王重旭\慈禧是怎样挪用海军经费的

王春瑜\唐代监察机制的启示
周楠本\略谈《致红军贺信》
章 明\最新现代版《葵花宝典》
焦 加\谈死后
易健常\玲珑园伴玲珑人
——山房前的揣想

王彬彬\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
黄 裳\“磁力”慢忆——怀念夏公
章诒和\梨园一叶
——叶盛长往事
黄伟经\一个二十年代新女性的沉浮
朱 健\诗人白莎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随笔》杂志社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592344
邮发代号：46-90 email:sui bi 2005@163.com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6元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下)

编者按：

本刊已经连续两期发表了几位同志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本期最后发表李锐、袁鹰、韩刚、孙大午等同志的发言和白建钢先生的贺信。

在纪念会上,还有五位老同志表示了祝贺,并做了简短发言。

李昌同志建议:《炎黄春秋》不仅要走下去,还要走出去,站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战略大开发的高度,扩展视野。他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炎黄春秋》应该办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春秋,和中央搞民族地区开发的大决策挂上钩。

于光远同志把《炎黄春秋》和人的一生做了比较。从少年时代走到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正当年,拳打脚踢,矛盾也最多。再往后年龄大了,地位高了,人也满头白发了。《炎黄春秋》现在是青年时代,正当年,要继续努力。

王强华同志回顾《炎黄春秋》的历史,讲

到其前身《中华英烈》杂志,介绍了主办《中华英烈》杂志的温济泽同志和他在《炎黄春秋》创办初期的贡献。

钟沛璋同志谈到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的评价问题。他强调说,陈独秀的巨大贡献是不可遗忘的。

冀煌同志说,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五大街上的浮雕,把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挤到一旁,是不公正的。《炎黄春秋》要继续坚持讲真话。

陈模同志在准备的讲话中写道:我对《炎黄春秋》深有感情,当作必读与学习的课本。它是全国最好的党史杂志和理论杂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秉笔直书,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甄别了许多历史冤案,歌颂众多的忠诚积极、无私无畏、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的人物。从第一年起,我每期到邮局、书摊去买杂志,以后14年一直坚持自费订阅。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这个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最信赖的最好的老师。

开放言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李 锐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

《炎黄春秋》办了十五年,很不容易。从开办以来,我同这个刊物就有来往,最近在七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同陆定一谈话的记录,即他对党和国家大局的一些看法。我在党内生活了七十年(包括1959年后开除党籍的二十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关于历史的许多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从理论到实际,指出了中国应向何处去。当年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遭到人们的唾弃,认为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

靠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来访的黄炎培说过:“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他随后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可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按照陆定一讲的,我们走入了一条同这种追求和声明相悖的道路,走入了一个误区:以各种政治运动“兴无灭资”,快速建立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而贬斥资本,贬斥知识,大整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搞个人崇拜,搞“马克思加秦始皇”;于是

一次次运动，最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运动到崩溃的边沿。这个误区，当然同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同向苏联“一边倒”有关；当然也同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有关，他从马克思那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宣言》还有其他语言，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尤其马克思晚年对早年的革命学说已有所修正，恩格斯晚年也赞成通过议会道路取得胜利了。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这是近年来，我常常谈到的。

第一个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国，到底依靠什么？现在我们中央领导也常讲科学发展观，即必须靠科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有了电脑以后，通过知识经济，进入信息社会了。二是大家天天讲的民主。三也是大家天天讲的法治。四是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这四项属于全人类，也属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恐怕不必再争论了吧。现在讲和谐社会乃至和谐社会主义，离开这四项又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义和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在历史进步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应该占什么地位？上个世纪出的问题，1949年以来出的问题，好多同它们分不开，现在还写入宪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李普说过一句话，好像是一个老将军说的，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在座的黑头发的，他们没有缠过脚，我们都缠过脚，我们都是解放脚，而且戴过紧箍咒。

第三个问题，党的问题要搞清楚。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过去毛泽东讲过：“我就



李 锐

是无法无天”。党没有法，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亲耳听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要一点的”。但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与邪教是一个词。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

我最近在好多场合谈过两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从事理工搞自然学科的。一本关于历史。作者张钦楠，是建设部搞建筑行业的总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七十多岁了。他写了一本《读史札记》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东方到西方各国，从革命与改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历史发展的对比，认为民主、共和、

宪政、信仰与思想自由、人文

精神、市场经济、人权观念等，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几大基石和标志。此书已经公开出版了，作者还在继续增补内容。第二本是《综合哲学随笔》，作者高亮之是一个老干部，也七十多岁了，原南京农学院院长。他的《综合哲学》不赞成把哲学只搞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那样强调斗争，认为“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互相综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 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此书也已公开出版了。

两位作者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深刻的反思，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如此独到的理论著作。这两本书我都寄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供他们过目。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历史的问题、关于理论的问题、关于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还常常在误区之中，各种挂碍多得很。例如陆定一的谈话，我不得不删掉一些字，加上另外的字。

《炎黄春秋》在做的工作主要在历史方面，一

一直在作历史反思,当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最深刻的反思源于最深刻的教训。这一点德国人比较做得好。德国二战死亡400万人,战俘700多万。德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对一个民族最危险的就是集体狂热。我们的“文革”就属于集体狂热。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4年6月6日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典礼时说:“正是(盟军)登陆的胜利,使德国人从纳粹暴政中获得解放,并非战胜德国而是拯救德国;此日象征的是自由而不是征服或失败。”这种反思的深度,日本人就差得很远。

我最近读书,抄了几段话:

爱因斯坦《我的政治理想》:“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见到的那种制度。”

爱因斯坦的另外一段话:“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有人这样正确地说过: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百花

盛开,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比较独立。”

我还抄了一段林肯讲的话:“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丛生。腐败产生于什么地方呢?就同我念的上面这些话有关。是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因此有人叫我们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不错,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除开腐败丛生以外,资源浪费厉害,环境破坏严重。

我们现在的硬实力还可以,但软实力,就是政治制度,还有待大改革。《炎黄春秋》就是在软实力方面作文章。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做工作。

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同全球化接轨,就一定要深化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我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突破点。

我今年进九十岁了。八十八岁时有一首自寿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没想到老同志们 今日思想如此年轻

● 白建钢 (深圳名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刊理事)

今天,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炎黄春秋》的作者、领导、编辑多是七八十甚至九十多岁革命老人。他们老了,经历过创建共和国的战争,领导过共和国党政军部门、地区,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锐,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



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缺少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有的人老了,但他还年轻,这是国之珍宝,是年轻人的镜子;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这是国之问题,需要国家加以改变。《炎黄春秋》精神,使人青春永驻,愿我们社会永不变老。

希望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



● 袁 鹰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今天有很多老同志、老前辈在场,他们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是作为《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发言。我家的报箱里报纸、杂志很多,一天得拿两次。说实话,有一些杂志只是浏览一下,有的根本不开信封。只有《炎黄春秋》,每期基本从头到尾全看完了。如果哪一期来晚了,我们全家就着急。是不是哪一

篇文章使某人不高兴,某篇文章犯了禁忌,不让发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急,又不好问。我弟弟是人民解放军总后的离休干部,他也订了一份《炎黄春秋》。有一次,到日子没有收到。他很着急,很担心,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人封了。后来收到了,他才放心。

有很多读者为《炎黄春秋》的安危悬心。也许这种悬心是多余的。现在,我国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不应当、也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那种事。但是,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恰恰有一些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发生了。我们的悬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7期收到了,不到四天,我们全家人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关于陆定一的文章,关于张闻天的文章,很好,很重要。过去我还没有看到全面、完整、准确地介绍托派的文章,在这一期上看到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托派”比国民党、特务的问题还严重。有很多人,因为沾了“托派”问题,一辈子翻不了身,最后含冤终其一生。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很有才华,写了不少好作品。在上中学时的一个假期,在苏州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说这个读书会和托派有关,他也因此受审查。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历次运动,他一次一次地说清,但总也说不清。结果一辈子没有说清,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去世了。这一期的这篇文章,把托派问题说清了。

我自己读《炎黄春秋》这么多年,从中了解到很多党史问题、理论问题,对现代史上很多人物也有了新的认识,受到了实事求是的教育。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带着十分感谢的心情,带着希望继续受到教育的心情,写了两句话:

炎黄正气春秋笔,
志士襟怀父老心。

文天祥写了《正气歌》,其中提到一些人,就提到董狐。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为我中华民族大树正气。

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

● 韩 钢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年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兼具思想性、学术性、普及性的刊物，已经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尽管它没有被定为什么“国家期刊”、“核心期刊”，但是它在海内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恐怕是某些“国家期刊”、“核心期刊”无法企及的。作为一家杂志，这就是成功，虽然它也经历过、也许还会经历波折和坎坷。

《炎黄春秋》的成功之道，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作为读者，我无力全面概括。不过我注意到，这家杂志非常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近些年来尤其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这是它特别吸引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的一个优点。我做了一个粗略统计，10年前的1996年和1997年，《炎黄春秋》发表的反映80年代以来历史的作品，分别是13篇和14篇；而2003年到2005年，每年都在20篇以上，最多的到30余篇；今年的前7期，这个数字就已达到18篇。这个统计，大概能够支撑我的上述判断吧。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57年了。如果要划分段落的话，这57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27年（到1976年）或者29年（到1978年）和后30年或28年。没有人怀疑研究这57年的当代中国史的意义，但是，梳理一下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又不能不看到，有关前半段的历史，已经有了不少可观的成果；而有关后半段的历史，坦率地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这一段可以说是当代中的“当代”历史，竟然是如此研究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这个传统的涵义也许是多重的，但是被人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当朝人修当朝史，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迄今为人乐道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克罗齐本人怎样解释，许多人更多地是从负面



意义理解这句话，即认为历史知识都是后来者按照现实需要或即时理解来构筑的，这样一来，历史便不是对已逝过程的还原而是曲解。

这样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研究者对当代史的关注，我不敢肯定；但是，对这样的观念我表示怀疑。人们对当朝人修当朝史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可以佐证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可是，一旦将这种担心、这种观念绝对化，就不能不显出其片面性来。其实，当朝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即便有所反映，也难达到当朝人直接感受的程度。何况，就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而言，也需要从当代人开始积累，否则，遗留给后来人的文献档案未必完整和丰富。近些年来，旧文献旧档案大量流入旧货市场，就是一例。如果不是一些有识之士收购一部分，这些文献档案化为纸浆、遗散废弃也未可知。所以，当代人修当代史，应该是有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近30年来的中国，虽然没有经历像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大动荡，但也是风雨兼程，绝非坦途。围绕中国发展的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这些年来发生过多少“事件”、多少风波！如同人们希望弄清楚过去的历史一样，人们也希望弄清楚当代的历史。去年以来的“反思改革”之争，不正是一例吗？姑且不作价值判断，单就史实而言，君不见，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就有许多已有争议、需要“考证”的问题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炎黄春秋》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可贵的探索。可以相信的是，它还将持续地作这种努力。这是读者的祝贺，也是读者的希望。

老同志们多说真话对我们有益

● 孙大午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现任大午集团监事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喜欢她讲真话,不讲假话,很少空话,很少套话,喜欢她实事求是,对历史进行反思。

《炎黄春秋》的文章大都是老同志们的回忆。老同志们有机会、有智慧、有勇气说实话、说真话,对我们非常有益。我觉得有个词用来形容老同志们的追求是很形象的,就是“两头真”。我觉得“两头真”也意味着春的萌动和秋的收获这个意境。老前辈们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冷大热,从严冬酷暑中走过来,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和非常深刻感悟。我觉得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祝愿在座的各位老前辈、老同志心情愉快、健康长寿。我深信上天也会让你们健康长寿。因为你们身上负有历史责任,就是把你们的真实经历、真实感悟说出来。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就是你们健康长寿的使命。

我希望老同志们有机会就多说话,多说话对我们有益!

我认识一位老同志,他在最近几年里写了3本书,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他说我把这些书写出来以后,我心里就踏实了,放下心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有时我就想,“两头真”们著书立说,不仅是让乱臣贼子惧,也是在为我们开辟未来!我想建一个“两头真”纪念馆或者“两头真”纪念林。但是目前有些困难,因为一些手续很难办。我想把一些珍贵的史料,把老同志们的音容笑貌都收集保存下来——这是



我的一个梦想。

我知识有限,在我有限的知识中,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历史是穷富矛盾还是官民矛盾?我们的历史,真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穷无苗,富无根”,通过劳动,穷富是常常互相转化的。我一直看到的历史,是官民矛盾。如果说,当官才能发财,我们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也是一种官民矛盾。在我的体会里,以穷富定阶级并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说法不一定科学,起码在我的企业里看不到。因为企业搞好了,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奖金可以多发。我作为一个企业主,看到的是企业主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有官方背景,对工人进行压榨,那还是官民矛盾。这就是我的体会。

我喜欢《炎黄春秋》,是因为她不仅在反思历史,还在关注现实。今年第六期的《炎黄春秋》,就刊发了我的文章,《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以解决三农问题。农村为什么穷,为什么起不来?是因为农民受管制太多。在80年代,农村有乡镇企业,哪有三农问题?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把农民都管死了。在农村,不仅是籽种、化肥专卖,教育、医疗、金融全都处于垄断状态,农民连杀个猪都不行,形象地说,农村是“八个大檐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和剥夺,使农村富不起来。我在农村创业、搞企业已经21年了,我们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开始,从1985年滚动积累发展到现在,我们没有贷款,但(下转46页)

欢迎订阅2007年

《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 话: (010) 68532048

传 真: (010)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 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 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 免付邮费。



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关系认识的修正

李庄和我在动乱年月的一段经历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ISSN 1003-1170



1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